

## 內容說明

小林多喜二（一九〇三—一九三三年）是日本最傑出的革命作家，在他短促的十年創作活動和實際鬥爭中，寫出了不少輝煌的作品，為日本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樹立了旗幟。他於一九三一年日本革命運動最困難的時期加入了日本共產黨，次年即被迫過着地下生活，繼續領導黨的文化活動。這本書是他後期的代表作品，作者依據自己地下生活的體驗，寫一個共產黨員完全捨棄了個人的生活，一面防禦反對法西斯統治的逮捕，一面領導一個軍需工廠中工人羣衆改善待遇和反對侵略戰爭的鬥爭。他在尖銳的戰鬥生活中，不斷地克服着殘餘的小資產階級意識，逐漸鍛鍊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英勇、頑強和機智的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



在洗臉室洗手的時候，恰好看見第二車間的工人們從窗下走過，響起了接連不斷的、雜亂的草鞋和皮鞋的脚步聲，混合着大聲談話的聲音。

「還沒有回去嗎？」

這時候，須山從後邊走過來對我說。他是第二車間的。我轉過塗滿肥皂沫的臉，皺了一皺眉頭。——因為我早就和須山約好：不要在放工的時候一塊回去，恐怕被別人看見，萬一以後出了什麼事，就會互相牽連。可是須山常常破約。他還親切地笑着說：「別發這麼大的脾氣呀！」須山完全是一個明朗可愛，令人沒法討厭的人，在這種時候我也只好苦笑。但是在現在這樣嚴重的時期，我就只能給他難看的臉色。而且今天他還要領新會員到一個點心舖裏去呢……可是，我忽然發現須山的臉上不是平時的調皮樣子，立刻感到了只有做我們這種工作的人才會有的那種預感，——「好，馬上就走。」我說着，急忙洗完了臉。

須山見我已經明白了，立刻換了腔調，在我身後說：「喝杯麒麟啤酒去吧！」這雖是須山平常說話的口氣，可是我立刻覺得，那聲調有些不正常。

出了工廠，須山走在前邊，離開我三四丈遠。從工廠到電車道的路，是很狹窄的小道，一邊是高架電車的路基，一邊是商店房子。在第二根電桿那兒，站着一個便衣特務，正往這邊望，却故意做出好像並不往這邊望的彆扭樣子。我立刻跟後邊過來的五六個人走在一起，一邊說着話，一邊提高警惕，用左眼角留意那個特務。那特務完全是被每天的例行公事弄得昏頭昏腦的樣子，顯出對一切都無所謂的疲倦的神氣。近來，他們每天都在監視上工下工的工人。須山故意跟他開玩笑，走過他身邊的時候，慢騰騰地邁開八字步，我看出他的意思，覺得好笑。

到了電車道上行人雜亂的地方，我追上了須山。他擦着鼻子，裝做隨便的樣子，向周圍望了一望：

「事情有點奇怪……」他說。

我看着須山的嘴。

「上田跟「鬍子」斷了聯繫啦……」

「什麼時候？」我問。

「昨天。」

我雖然明知道「鬍子」是一個沒有必要準備「預備線」的人，但也問了一句：

「有「預備」沒有？」

「據說是有的。」

從他的話裏知道，因為昨天的聯系有特別重要的事，如果延遲了一天，就會出很大的岔子。上田和「鬍子」約定在S川、M街和A橋三個電車站之間的街頭上會見，這是前天他們兩人從那裏走過的時候約定的。但是「鬍子」說：「如果萬一出點事就不好辦了。」因此在走過大街時又約定了一個他認為安全的咖啡館，說：「如果在街頭上碰不見，二十分鐘之後就到那家咖啡館去。這在「鬍子」是很少有的事。據說在分手的時候，兩個人還互相對準了錶。這個被叫做「鬍子」的同志，是我們最上級機關的一個重要聯絡員，一直到日前為止，在近千次的聯絡中（全部是在街頭會面的），僅僅遲到過兩次。做我們這種工作當然應該如此，但像他這樣的人畢竟不多。而在這兩次中，有一次是因為雙方都搞錯了，他還是在正確的鐘點裏去的。另一次是因為到了約定的那天下午，他不知道他的錶出了毛病。別人有一次沒來，還不要緊；可是「鬍子」沒來，又沒到預備

● 地下工作者爲了準確取得聯系，防備萬一發生事故以致斷了聯系，往往在決定了一個正式會面地點和時間以外，事先再規定一個預備的地點和時間。在正式地點和時間裏不能取得聯系時，就到預備的地點去接頭。

地點去，這對我們完全是不可相信的。

「今天怎樣？」

「嗯，說是再到昨天約定的地方去一次。」

「幾點？」

「七點——七點二十分到咖啡館。我看這情況，總不能放心，所以我已經約定八點半再和上田見一次面。」

我計算一下今晚上的時間：

「那麼，你和我在九點見一次面吧！」

我們定好地點以後就分手了。臨走的時候，須山說：「要是「鬍子」被捕了，我就自首去！」這當然是說笑話，但說得好像真的一樣。我罵了他一聲「混蛋！」不過却很瞭解他這樣說的心情。——「鬍子」在我們中間有很大的威信，是我們的依靠，如果說「鬍子」是我們的燈塔，也並不誇張。事實上，如果沒有了「鬍子」，從第一天起，我們就不知道怎樣進行工作。當然，工作總還是要進行的。我一邊走着，心裏一邊想：他最好不要被捕！

路上，走過一個小食品店，我買了一盒森永牛奶糖，帶着回去。我的房東家的男孩子，正和鄰近的孩子們一起站在一架自動出糖的機器前邊。往機器裏扔進一個銅子，一按把手，機器裏就會有球跳進棒球壘裏，球跳進不同的壘裏，從球壘下面的小洞也就落下來不同的糖果。最近，這種機器非常流行。在街上，每架機器前邊都圍着一大羣孩子，每個孩子爲了花一個銅子也許能得到比一個銅子更多的東西，都睜大着眼睛，用力地歪着嘴，去按那個把手。

我把衣袋弄得嘩啦嘩啦地響，掏出兩枚銅子給了房東家的孩子。孩子先是往回縮手，接着馬上顯出了滿臉高興。大概這孩子一直都是站在後邊看別的孩子們玩。我把剛買來的牛奶糖也塞進孩子的衣袋裏，就回家來了。

我必須在八點以前把今天工廠裏發生的事寫成稿子，才能趕得上在明天散佈的傳單上用。在八點鐘和S見面的時候，就得把稿子交給他。我從壁櫥裏取出裝着各種文件的皮包，打開了鎖。——倉田工廠本來是只有二百工人的金屬工廠，從戰爭●開始以來，已經招了六百個臨時工。我和須山、伊藤（一個女同志）就是在那個時候拿了別人的履

歷書打進工廠裏去的。原來只有二百正式工人的廠却招了六百個臨時工，可見突然增加了多少活兒。戰爭一開始，倉田工廠就停止了原來製造電線的工作，開始製造防毒面具、降落傘和飛機外殼。最近，因為這宗活兒告一段落，似乎工廠正在打算從六百個臨時工中裁去四百個人。因此，這些天來，廠裏都在談論着這件事。大家嚷着『要裁人了，』『要裁人了，』又說：『工廠裏從來沒有裁過臨時工。現在，我們不是比當初講好的期限超過了半個多月嗎！』事實是，雖然比當初講好的多幹了半個多月，但因為全都是急件，這期間幹的活兒簡直緊張得透不過氣來。女工們從早晨八點起，一直幹到晚上九點才下工，只不過掙一元零八分錢。從晚上六點幹到九點，一點鐘是八分錢，因為吃晚飯佔去二十分到三十分的時間，廠裏要從夜班工資裏扣去兩分錢或三分錢（這都是特別計算好了的）。吃飯的時候，我說：『工廠大概以為工人不吃飯也能幹活的吧！』和我在一起幹活的一個臨時工接上來說：『呵，一點不錯！』這句話說得很有勁，惹得大家都笑起來了。廠裏每天發工資的時候，把將近四百女工每個人應領工資的八分錢零頭，分別發給一枚五分錢的銅子和三枚一分錢的銅子。這樣一個一個的往下發，可實在太費事了。六點下班，就得等到七點。『真他媽討厭！就給一毛錢該多省事呵！要不就我們少要點，給五分錢算啦！』大家排在隊裏嚷嚷着。『我們可想不到這些守財奴的牛脾氣！』



這時候，廠裏又傳出了這樣的風聲：在裁臨時工的時候，工廠準備給每人發十塊錢。雖然當初講妥，因為是臨時工，不給額外錢，大概因為大家幹活兒幹得很好，所以才給這筆錢。——這話到底有多麼可靠？因為大家一離開這裏，總得有一個時期找不到活幹，也就半信半疑地指望起來了。但是大家沒想到連吃晚飯的時間都要扣幾分錢，爲了把一分錢的銅子三個一堆的擺起來讓幾百個工人白白等上一個鐘頭，像這樣的廠，能够給六百個工人每人十塊錢（十塊大洋呵！）嗎？製造這種謠言，顯然暗藏着工廠當局的策略。這是爲了防止在裁人以前，工人發生波動，最後用這一手來惑弄人罷了。

因爲今天廠裏大家都爲這件事紛紛議論，我準備把它寫在準備明天散到廠裏去的傳單上。在前天散進去的傳單上，就因爲反映了大前天工人們都在談論的——要求縮短發工資的時間的事（雖然是這麼一點小事），在工人中間得到了很大的好評。我盤腿坐在矮桌前邊，寫了起來。

過了一會兒，樓下的老太婆上樓來了。她對我說：『謝謝您剛才給孩子的東西！』她做着我從沒見過的笑容道了謝，又下去了。做我們這種工作的人，就是在無關重要的小事上，也得注意使自己跟平常人一樣。避免叫同住的人懷疑你是幹什麼的。現在正在獄裏鬥爭的王同志，爲了在比我們嚴重得多的追捕中活動——甚至他的照片都被張掛在

飯館、咖啡店、理髮店和澡堂裏，有一次他還請同住的人們一起到「帝國劇場」去看戲呢。我們還得學會和普通入說些毫無意義的閒話，學會應酬人。在這類事情上，我是最不行的，常常覺得毫無辦法。最近，總多少有些習慣了……

「沒什麼，那麼一點東西……」我對老太婆說。說完了就滿臉通紅，實在不高明。

雖然不過是寫兩張到兩張半稿紙的事情，但是，白天幹了一天活，一回來坐下就寫的，確不很輕鬆。好容易寫完了這篇揭露十塊錢津貼真相的稿子，已經過了七點。這中間，還拿手巾擦了多少次臉。寫稿子，就是令人出汗。寫完了，把稿子裝進信封裏，在封皮上隨便寫了個女人的名字，裝做一封情書的樣子。七點四十分出去，對樓下的老太婆說：「出去散一會兒步。」本來老是沉默着的老太婆，這回却看着我說：「您請吧。」果然效果很好，我苦笑着走進黑地裏。以前，有一次像往常一樣正要出門的時候，老太婆對我說：「怎麼總是往外頭跑！」我吃了一驚，事實是每天晚上都出去，難免叫人疑心的。我心裏撲登一下，勉強微笑着說：「可是，那個……」這時老太婆也笑了一笑說道：「因為是青年人吧？」我這才知道，老太婆說的原來不是那個意思，心裏才鎮定下來了。

八點鐘見面的地點，是在電車道上一條小胡同裏有許多小工廠的地方。這條路上，

商店裏的人和前額上披着絡頭髮的工人們是很多的。我一向盡可能使自己的服裝適應我所去的地方，雖然不能做得很充分，但這是一件很要緊的事。我們爲了避免隨時被當做行跡可疑的人遇到訊問，就得穿着整齊的服裝。然而，在今天這樣的地方，晚上八點鐘的時候，穿上洋服甚至拿着手杖，那是反而使人看了刺眼的。我現在是穿了一件乾淨的和服，隨隨便便繫了一條帶子，連帽子也沒戴就出來了。

在筆直的道路上，看見喜歡擺動右肩膀的S從對面走過來了，他認出了我，就繞到一家商店的櫥窗前，然後若無其事地拐進小路裏去了。我跟在他身後，也同樣拐了一個彎，然後到一個拐角上，兩人就並肩走在一起。

S聽我報告了前天散傳單以後的工廠裏的情況，又問了各個細節以後，他說：

「從工廠大家關心的事件出發，提出問題，固然是好的——但是，如何進一步從政治上提出問題來，這一點是不够的。」

我吃了一驚，看看S的臉。我想：他說得實在不錯。我現在僅僅滿足於對傳單的好評，可是忘記了應該從更高的角度上去看。S繼續說：

「所以，這只是追隨在羣衆自發情緒的後邊。爲了使他們能够從日常生活的不滿達到瞭解帝國主義戰爭的本質，這需要特殊的、有計劃的、頗爲專門的努力。——叫大家

明白這一點，是很必要的。」

他說：爲了糾正過去在傳單上出現的那種公式化的、抽象的反戰宣傳，現在却又相反的犯了把問題局限在經濟要求上的錯誤。正因爲這種右傾的偏向而做了羣衆的尾巴，我們的傳單才會在羣衆中發生了好印象。所以對於這種所謂「好印象」，仍然有慎重考慮的必要。——我們一邊走着，一邊談論着。

「這種做法，正像用木棍來接竹子，沒有什麼用處的。這是倒退！直到現在，我們好像是戴着眼罩的馬，看見的只是事物的一個一個的片面。」

走了一會兒，我們進了咖啡店。

「給你一封情書！」

說着，我把稿子放在桌子下邊的橫板上。——S用鼻音哼着歌曲，一邊留意着女侍，一邊把稿子塞進衣袋裏。接着，他問：

「你那方面和「鬍子」（他摸着鼻子下邊）沒接上頭嗎？」

我把今天工廠下班時從須山那裏聽到的話告訴了他。他故意用鼻子哼着歌曲，眼睛裏却集中了注意，聽着我的話，這是他的習慣。

「我那邊約定的是昨天六點，也斷了。」

聽了這話，我心裏騷亂起來了。

「是被捕了麼？……」我說，心裏却希望能聽他說一個「不」字。

「嗯，——」

S想了想說：「本來是個小心謹慎的人呵……」

我們商量一下怎樣接上「鬍子」那邊的關係，又商量了明天早晨怎樣把傳單送進去，以後，就分手了。

九點鐘，會見了須山，一看他的臉色就明白了。然而，這並不是說已經完全絕望了。跟須山商量了一些可能的辦法，繼續去調查「鬍子」的消息。馬上就分別了。

我們規定：因為路上危險，除了在自己住處附近的聯絡，一過九點半就不進行工作。——我離開須山，一個人往回走。「鬍子」的事情，意外沉重地壓在我的心頭。不知什麼緣故，一邊走着，一邊有一種很不安的感覺。膝頭發軟，呼吸很費力。——在普通的境遇裏生活着的人，也許會以為我這時的心境，有幾分誇張。然而，我們是與外部一切隔斷了關係，和個人的長期的朋友也都沒有來往的人；就是去洗一次澡，也不敢粗心大意，萬一被捕了，至少也得住上六年、七年；我們這樣的人所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同志。如果有一個同志被奪去了，就會感到彼此之間互相聯系着的深厚的同志的感情。假

使這是一個經常指導我們的同志，這種感覺就更深了。——以前，在一個反動工會裏作爲反對派進行合法活動的時候，即使發生同樣的事，也沒有這樣深的感覺。當然，那時還有各種各樣的日常生活，沖淡了這種感覺。

太田正在我的住處等着。——我的住處，對誰也沒有告訴過。經過上級同意，只能讓一個人（就是太田）知道。這是因爲在倉田工廠進行工作，很有必要規定一個經常和我聯系的專人；只在外邊見面，一發生緊急的情況就來不及了，也不可能充分地討論各種問題。

太田是爲了明天的傳單的事情來的。我把和S方才商量好了的辦法告訴他，讓他明天早晨七點到T車站的高架電車候車室去，S會到那裏去，把傳單親手交給他。

辦完了正事，我們稍稍閒談了一會兒。我笑着：『怎麼樣？閒扯一會兒？』太田笑了起來，說：『你這心愛的玩藝兒又來了。』平常，每逢辦完了事，幾乎成了我的老規矩：『閒扯一會兒吧？』我總是很有興致地說這句話。現在這就成了我的『心愛的玩藝兒』了。爲什麼我這樣的愛好閒談呢？最近，我才發現了這個原因。——我們爲了工作，幾乎是天天都和同志見面。這種時候，即使是在咖啡館裏也得盡量的放低嗓子，不說廢

話，只談工作。談完了，立刻離開那個地方，越快越好，各自走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當然，由於這樣的日常生活的情況，我已經清算了自己過去的生活方式，養成了習慣；但是正像長期住在拘留所裏的人，往往不能忍耐地想吃些『好吃的東西』，有時簡直像一種突發性的疾病。大概是生活單調的緣故吧，和同志們在一起的時候，就喜歡閒談一會兒。在過着普通生活的太田——這個可以常常在啤酒店裏暢飲啤酒的人，對於我的這種心情，只認為不過是我過去散漫性格的反映，他是不能理解的。有時他很『殘酷』地（！）一句閒話也不說就走了。

太田扯了一會兒廠裏許多女工的事，回去了。他不知在什麼時候知道了許多女工們的事，實在可驚。

『女工們的戀愛，跟資產階級小姐們那套膩胃的形式主義不同，她們就是直接而具體的！』太田說。

『直接而具體的』，這話很可笑，我們就大笑了一陣……。

## 二

因為散了一次公開用黨署名的傳單，倉田工廠早晚上工下工的時候就立刻緊張起來

了。正當戰爭時期，製造的是戰爭物資，這使得工廠當局狼狽起來了。有一天早晨，在我旁邊做工的一個女工，嚷着跑進來。原來工廠大門旁邊，有一座倉庫，倉庫門什麼時候都是黑幢幢的開着的。這女工這天和平常一樣，從那裏走過，忽然看見有一個頭上蒙着黑衣服的傢伙，在角落裏蠕動着，後來才知道，這傢伙就是守衛。從這些事上，也可以看出那些傢伙正多麼慌張。

戰爭一開始，工廠裏年輕的工人不斷地被徵去入伍。同時，軍需品的製造却急劇地增加了。爲了解決這個矛盾，所有的工廠都不得不大量僱進新工人。以前，就是僱一個工人，也要經過嚴格的調查，而且還得有保。戰爭起來以後，他們就不可能這樣辦了，我們也就抓住了這個機會。當然在這時候僱進的工人，是臨時工，在所謂『國家非常時期』的名義之下，大量使用臨時工，就可以把全體工人的工資降低。可是對於工廠，有利必有害，就不得不無恥地弄來一個頭上蒙着黑衣服的傢伙，來偷偷地監視工人們。

黑衣服之類倒沒有多大關係，埋伏着等待我的，却是穿西服的特務。我的照片正傳散在各警察局裏，我雖然化裝了一下，但是也不能大意。——有一個同志，只因爲警察局裏有一張他十三年前的照片，就被一次也沒見過他的特務逮住了。有些同志勸我完全地『祕密』起來，我沒有那麼辦。根據經驗，在工廠以外進行組織工作，的確要增加百



倍困難，還收不到百分之一的效果，這還是指能够和工廠裏的同志保持密切聯繫的情況說的。我們所說的『秘密』，當然不是隱居起來的意思，也不單是把身體隱藏起來，或是逃跑的意思，——不瞭解的人或許會這樣想的。如果秘密起來，就是指以上所說的意思，那倒不如老實讓他們捉去，呆在拘留所裏要痛快得多。所謂『秘密』，是爲了隔絕敵人的攻擊，去進行更大胆的而且更堅決的鬥爭。——當然，爲了工作和其他的方便，我們最希望的是進行『合法』的鬥爭，所以我常常對太田他們說：要儘可能長期保持我們的『合法性』。從這意義上看來，所謂『秘密』並不是正確的說法，我們決不是自己要秘密起來，而是他們要我們秘密起來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冒着在敵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危險，早早晚晚防備着穿西服的特務，實在傷腦筋。如果這一向站在那裏的是同一個面孔的特務，那倒還好；若是有時遠遠看來好像換了另外一張臉時，我就得把步子放慢，把帽舌子拉低一點，在走到他身邊以前，搞清楚是不是我所熟識的那張臉。過了這一道關，其次就是門衛老爺的檢閱。爲了讓拿傳單進去的人不被他們逮住，太田總是叫女同志帶傳單的。照太田的說法就是：『只有放在女人肚臍下邊的地方最安全。』那些傢伙好像還沒有無恥到連那裏都要搜查的地步。

第二天早晨，打開工服箱，發現裏邊放上了傳單；一剎那間，波浪似的感情刷的一

下傳遍了全身。走進車間，在我旁邊做活的女工，正在讀着傳單。像個小學生似的，一個字一個字地唸着，遇到不認識的字，就把小指頭放在頭髮裏搔着。一看見我，她就問：

『這是真的嗎？』她是指的十塊錢津貼的事。

我說：『不但是真的，簡直是真得很呀。』

那女工就說：

『真可惡！』

工廠裏，大家已經把我當做『好像是那種人』的。我不管有沒有傳單散進去，只要聽見大家談論廠裏的事，也不管是大事還是小事，總是積極地插進嘴去，注意把大家引導到正確的方向。我必須經常取得羣衆的信仰，使他們相信，在遇到什麼事的時候，我總是能夠站到大家前頭的。因此我們必須永遠站在羣衆的面前，爭取大多數的羣衆在我們的周圍。以前，在工廠裏，總是採取偷偷地個別吸收的關門主義的方法，後來，在實踐中證明了：這種作法，到什麼時候也不可能使我們的運動成爲羣衆性的運動。

在開工以前還有一點時間，我正想到大家圍成一團說着話的工作枱那兒去，工頭跑進來了。

『誰有傳單的，拿出來！』

大家都無意識地把傳單藏起來。

「藏起來，可沒好處……」

工頭對我身旁的那個女工說：

「你，拿出來！」

女工順從地從帶子裏把傳單拿出來了。

「哪有像你這樣的傢伙！把這種危險的東西，當寶貝似的藏着！」工頭說着，苦笑  
了。

「可是，廠裏幹的也太厲害了呀，大叔！」

「所以囉——傳單就不是好東西呀！」

「是嗎？照你那麼說，不幹的時候，真能給十塊錢津貼了？」

這把工頭難住了。

「我哪裏知道？你問廠裏去！」

「有一次，你不是也那樣說過麼！嗨，可見傳單上說的是真話！」

女工的話，引得車間裏的人全笑起來了。

「好呀，說得對！」不知是誰說了這樣的話。

老頭子滿臉通紅，慌忙擦擦鼻子，說不出話，氣沖沖地走出去了。——我們第三工房的人，在後邊大聲地鬧了起來。事情很小，可是這麼一來，老頭子也忘了去向別人要傳單了。

這一天，開工還不到一個鐘頭的時候，聽說太田從工廠裏被捆走了。大概是送傳單的事被他們發現了。

最着急的是太田知道我的住址。

以前，他說過：如果出了事，我一定堅持三天。當我問他：三天是怎樣估計出來的？他說：大家都是這麼說——堅持三天，就好像成了規律似的。當時，我記得還和他說了幾句笑話，可是我忽然感到，太田好像有些軟弱的地方。當我聽說太田被捕了的時，來到我腦子裏的第一件事，就是這個。

我認識一個同志，和他同住的人被捕了，可是他還是若無其事地住在老地方不動。我和別人都叫他立刻轉移，但他認為這是大驚小怪。不出所料，就在第五天上，他的住處被襲擊了。他從窗子跳出來，可是把腳摔壞了。警察怕他又在半路上逃走，把他脫得光光的逃走了。到了拘留所裏，一眼看見先前被捕的那個人，就怒罵着：「混蛋，沒用

的傢伙！』可是，據說那人倒想對他說：『你才是沒用的傢伙呢！』——那意思是說：既然我已經被捕了，爲什麼你還稀里糊塗地住在那裏不走呢！以後，那個同志出來的時候，我們對他說：『我們不是沒對你說過，明明知道危險，還是麻痹大意，結果果然被捕了，這是組織紀律的問題！』他反過來說：『那是因爲那個傢伙（先被捕的那個）說出來了。只要在警察面前吐一個字，那才是組織紀律的問題呢！』事實上，這個同志本人在審訊的時候，真是一句話也沒有說。這個同志從來沒想到自己嘴裏會說出什麼，因而也就沒想到別人會說，所以就糊里糊塗地住在那裏不走。這時候，我比誰都感覺到他的話是刺到了我的痛處。我叫人轉移住址，這就等於承認自己如果被捕，三、四天後就會說出那個住址來的。這是和布爾什維克完全無緣的態度。——這是常識。從此以後，我們就把那個同志的態度當作模範來要求我們自己。可是，現在對這個不太可靠的太田，我却不能像在上面所說那樣照常守在自己的家裏不動。我必須立刻搬家。

但我總覺得最好還是不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的住址。曾經有一個優秀的同志，讓七個人知道了自己的住處，經常出入。其中不完全是同志，也有『同情者』。結果這個同志的住處被襲擊了。我們必須時刻記住：我們是處在號稱世界第一完備的警察網的追捕中進行工作的。

幸而太田並不認識須山和伊藤芳。我曾經打算：爲了工作的便利，把我們所信任的兩個好同志介紹給太田；然而考慮到以後的事情，就沒有這樣做。第一，爲了在一定限度上防備發生事情的時候遭受牽連；同時我也考慮到：認爲誰都是自己人就隨便信任人，這是一種危險的方便主義。

工廠放工的時候，我和須山、伊藤芳一道在一家點心舖裏匆忙地商量了一下，決定我馬上（今晚）搬家；在情況弄清楚以前，暫時不去上工；只和留在廠裏的同志保持着更密切的聯系，再決定第二步、第三步的做法。有很多同志曾經在『今天大概還不要緊吧，』『究竟不會出這樣的事，』這兩句話上，出了毛病。以上三件事情作爲工廠支部的決議，叫我必須執行。須山從剛領來的一天的工資裏，拿出八毛錢，伊藤芳拿出五毛，都給了我。

須山照他一貫的脾氣，不知想到了什麼，問我知不知道神田伯山●的話。我笑了笑說：你又想起你的典故來了！從他的話裏知道：神田伯山說過，不管在什麼時候，腰帶裏總得帶上一百塊現金，不論有什麼事都不花掉，（到死爲止）帶着這筆錢。他認爲一個人說不定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會遇見突然的災難，如果在這種時候，因爲手裏沒有錢而受到男子所不應受的意外的恥辱，那簡直是非常之不得了的事！

『就是這個道理，如果因爲手裏沒有錢，動不了身被捕了，那就等於是對階級事業不忠實！』

這樣說着，他又補充了一句：『我們也得學習這種經驗教訓！』我和伊藤芳說：『須山的腦袋裏裝着各種各樣的典故，正像一本貼報簿一樣。大家都笑起來了。』

我很大意地拐過了往寓所去的小胡同口。不過也許還不能說是我的大意，因爲首先，我沒有想到太田會這樣快就把我的住處說出去了。我發現二樓上我的屋子裏有燈光！陡然地站住，我還直覺地感到屋子裏好像還不只是一個人的樣子。毫無疑問的是在守候着我。可是，屋子裏還有不少東西得拿出來，也有明天就要用的東西。然而，我知道這個『可是』是不行的，立刻打消了這個念頭。

我沒有馬上可去的地方。過去的流浪生活，幾乎把所有認識的人家都利用過了，那些地方都不能再去第二次。現在，首先我得立刻離開這個地區。走到電車路上，我向四周圍打量了一下，叫了一輛拉客的小汽車。並無目的地說：

● 神田伯山是一個說書的名藝人，後來就成爲日本的說書藝人的通稱。

『到S街，兩毛錢！』

這時候，我才忽然注意到，我剛從工廠回來，沒有換過服裝，跟這小汽車很不相稱。——坐在車上想，仍然想不出可去的地方，心裏非常焦急。只有一個女人，曾經爲我設法找過一兩次躲避的地方。如果去求她，一定會幫助我的。這女人在一家小公司裏做事，借住在一家商店的三樓上。她對左翼運動是同情的，但並不積極地參加什麼工作。我雖然知道這女人的住處，但是到一個獨身女人那裏去是很不合適的，從前有事的時候，我總是掛一個電話到她的公司裏去。可是現在我只剩下這女人的地方可去，那就不能考慮得太多了。我在S街下了汽車，決定到她那裏去，就上了電車。

我盡可能找一個角落裏坐下，兩手放在膝蓋上，做着無意的樣子把電車裏的人看了一遍，幸而看來沒有『可疑的人物』。我旁邊坐着一個好像銀行行員似的穿西服的人，正在看着東京朝日新聞。一眼望去，看見在第二版當中有一條『搜捕倉田工廠的赤色分子』的標題。望了好幾眼，可是看不清本文。——這時候，我開始感覺到電車走得太慢了，有一種坐立不安的心境。

爲了小心，在前兩站就下了電車，走進一條小胡同裏，拐了幾個彎，向那女人的住處走去。因爲是第一次來，又是走的小道，有點迷路了。那商店門口，有一個老頭兒露



出了貼着膏藥的肩膀，在用手拍打。我問他：樓上的笠原在家嗎？他看着我的臉沒作聲，我又大聲地問了一句。他這才向着隔一道紙門的茶室那邊說了一句什麼話。有一個人從門上的玻璃裏往這邊看着。從裏邊用狐疑的口氣說了一句：

「呵，出去啦！」

我爲難起來了。問什麼時候回來呢，回答說是不知道。大概是看我的樣子（服裝）有點怪吧？我在那裏站了一下，沒有辦法，只好說：「我九點的時候再來吧。」就走了出來。望一望三樓，沒有燈光。我真有點喪氣了。

到有夜市的街上去看了看書，又在擺攤的地方看了一會兒，又到咖啡店坐坐，好容易混過了兩個鐘頭，又回到那裏去，拐過彎，望見三樓的窗子明亮了。

我對笠原簡單地說明了情況，問她有什麼地方可住。可是，凡是她所知道的地方，都是我住過的。公司裏雖然有三兩個女朋友，可是她們對於革命運動都完全無知，而且還都是獨身女子。『笠原低着腦袋不斷地想了又想，還是想不出個地方來。一看錶，已經快十點了。十點以後在外邊亂跑是最危險的，我又是穿了這麼一身工服，更多一層危險。如果是女朋友，那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想辦法的，『可是你是個男子，那可沒有辦法了。』笠原笑着說。我也沒有辦法了。爲了不使自己被捕，就只剩下一條道路，但要

把這話說出口來，是需要勇氣的。

『在你這裏，怎麼樣？……』

我下決心說了出來。結巴着，臉都脹紅了。——看來有些太大胆，可是實在沒有法子。

『……………』

笠原立刻睜大眼睛看一看我的臉，嚥了一口氣，臉上也脹紅了。好像有點慌亂的樣子，忽然把坐着時一直伸出去的兩腿縮回去跪着坐了。

過了一會，她下定決心，到樓下去預先告訴了一聲：說是住在S街的哥哥來了，要在這兒住一晚。說是哥哥，想來也有點可笑。她雖然很樸素，但平常總是穿着很整潔的洋服，留着流行的半長髮，怎麼忽然來了一個穿工人服的哥哥！樓下的老太婆什麼話也沒說，從上到下打量着孩子氣的笠原。笠原的臉上禁不住顯得緊張了。對於一個普通的女人，留一個男子在家裏過夜，確實是非同小可的事情。

這樣一決定，兩個人都覺得有點不自然，話也說不下去了。我向她借了鉛筆和紙，在蓆子上伏下身子，訂立明天的計劃，立刻派人接替太田的工作，把太田被捕的消息寫在傳單上告訴倉田工廠的全體工人等等。我用鉛筆很快地寫着稿子。忽然想到女人自己

是不會說出要睡覺的。於是，我問她：

「你每天什麼時候睡？」

「大概都在這個時候……」

「那麼，睡吧！我的工作也完了。」

我站起身來，打着哈欠。

只有一條墊褥，她要把蓋被拿給我，我拒絕了，單蓋一件棉袍就躺下了。熄滅了電燈以後，聽見她走到角落裏去，好像是在那兒換睡衣。

自從離開家庭，一直在到處流浪，像這樣的睡覺已經習慣了，一躺下就能睡着。可是，住在一個單身女人的屋子裏却還是第一次，任怎麼也睡不好。我迷迷糊糊地做了個夢就醒了，這樣地，一連醒來幾次。總是夢見被人在後邊追趕着。做夢，大抵都是這樣的，被人追着逃不脫了，心裏一着急，啊啾一聲，就醒過來了。勉強把自己鎮定下來，半邊腦袋十分鈍重。我好像覺得沒有睡着過，不知翻了多少次身。——可是笠原好像一整夜都沒有翻一次身，我沒有聽見她動過身子。我知道她是早準備一夜不睡的。

不過，我至少是睡了一會兒，睜開眼睛的時候，笠原的被子已經疊好了，她不在屋裏，也許到樓下做飯去了。過了一會兒，笠原踏響着樓梯走上樓來。她問：「睡得好嗎？」

「啊。」我不好意思地回答了。

笠原上班去的時候，我和她一塊出來。樓下的老太婆正在廚房裏幹活，看見了我們，就住了手，在後邊目送着我們。

走到外邊，笠原好像要把昨晚上一夜的鬱扭一下子吐出來似的，大聲地透了一口氣：

「啊——啊——」

又輕輕地罵了一聲：「賊老婆子！」

### 三

這天晚上和S見面的時候，對他說了昨晚的事。他說：這很糟糕。便給我籌備了租房的錢。我已經找到了房子，等須山和伊藤給我弄到傢具，立刻就可以搬進去。起初，決定不了仍住在倉田工廠這個地區裏究竟好不好。在同一個地區裏，相當危險；可是住別的地區，交通費就發生困難。住到別的地區去當然要好一些，不過，我想警察也許認為我已經逃到別的地區去了；出於他們的意料之外，仍然住在原地區也並不壞。曾經有過這樣的事，一個現在已經到蘇聯去了的同志，當他聽說有的同志用這種戰術來工作；爲了在江東活動，故意放出經常出沒於城西的風聲。他就說：這種方法很笨，如果是我，

要在江東活動，就要造出在江東活動的風聲。——這地區的特務們還沒有認識我的真面目，加上不在工廠做工了，從經濟條件說來，也是決定住在這地區裏好些。

租房子條件最好的，是在小商人家庭的樓上，房東又是一對老夫婦。這種人跟我們的工作離得很遠，對於樓上的房客的行動，理解也有限。如果是住在那種半吊子的知識分子家庭裏，他們一見你的行動和房間的樣子，就會敏感地嗅到你與『常人』不同的氣味。只是警察常常到小商人之類的家庭裏來查戶口，而且調查起來又很不客氣，跟他們對待比較有門面的住家不同，到那兒應該去兩次的去一次，去了也只是問一聲『有沒有事』。這次我找了一家兩者中間的人家。這家的女人據說從前是在審子裏的，現在好像是什麼人的外室。

須山和伊藤給我弄來一副行李，好容易安定下來，我深深透了一口大氣。只是樓下還住着別的房客，是一個缺點。因此首先得知道這是什麼樣的人。我下樓到廁所去，看見那人的屋子的紙門打開着，本人不在。我首先望一望他的書櫃。這是我每到一個有同住人的新住處，第一就要注意的東西。一看書櫃，立刻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書櫃上放着一些非常普通的書。好像這是一個什麼學校的教員，很多是地理歷史之類的書，但桌子上還放着一本日本文學全集。一眼看去，正是打開在有片岡鐵兵和

葉山嘉樹●的照片的地方。不過這種書只有這一冊，別的似乎沒有。

有時，常有這樣的例子，我們的同志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住處，可是却發現房東原來是在警察局做事的。能立刻知道房東的職業還好，可是也有住了一個多月還不知道的。「您家先生是做什麼事的？」這個簡單的問題，照我們的身份，是不能隨便問人的。

我向老婆子問了澡堂的地方，就走出去作第二步調查。我拿着肥皂和毛巾，閒散地走着，先注意每天出入必須經過的每家的門牌。走過了五六家，在拐角上看見了一個「警視廳警察」的門牌，不過是在一家大邸宅的後門上，用不着十分擔心。從澡堂出來，又調查一下附近的小道和岔道，就回來了。一般地說，這個地區（也許別的地區也是這樣）的特點，是工廠街和富豪宅第緊緊連接在一起。這地方雖然和倉田工廠在同一個地區，可是走出亂紛紛的大街就是清靜的住宅區。它的好處，又在於走完了清靜的長道，立刻就可以走進熱鬧的市街，工作回來的時候，可以看清是否身後有人跟踪；從家裏出來，馬上就走進熱鬧市街，這也是很好的條件。

在二樓上的我的房間的窗子外，就是晒台，一步可以邁到鄰家晒台上，可以從這裏很容易地越過別人家的牆頭。因此我準備買一雙草鞋放在晒台上，只要一開窗子就可以穿上●。不過，討厭的是這裏的房子都像是巴黎屋簷下●那樣緊擠在一起，稍微打開一

下窗子，就有被周圍五六家人家和住在那邊樓上的房客看見面孔的危險。在弄明白這些人家的職業以前，我只好把四面的窗子關得嚴嚴的。爲了和房東應酬應酬，我就下樓去了，想從閒談裏瞭解一下附近的情況。

一打聽，在左近住着的，有法律事務所的事務員，三味線●的教師；那些住在樓上的，是股票經紀人，『婦人會』的支會，還有七八家公司裏的職員，還有一家是一帶最有錢的，家裏有鋼琴。剛一搬來的晚上，就瞭解了這些鄰家的情況，實在是頗大的成功。除了那種多嘴多舌的『婦人會』以外，可以說環境還不錯。

但是，根據過去的經驗，爲了防備住處被襲擊了或是發生了意外的變故，必須另外準備一個立刻就能够住宿的地方。不管看來多麼安全，也並不能說永遠都是安全的。以前，我剛搬到一個住所的第二天，從澡堂回來的時候，看見門前站着一個穿西服的人。這是一條筆直的道，發現了這個人的時候，已經走到跟前，來不及往回轉了。我沒有法

● 兩人都是當時的左翼作家。

● 日本人在室內不穿鞋子，這兒說準備一雙草鞋，是爲了可以在必要時逃跑。

● 法國影片名。

● 三味線是一種樂器。

子，只好故意搖擺着身子，把頂在頭上的濕毛巾掛到快碰着眼睛，口裏吹着模糊記着的：『我追求着那個幻影，在遙遠的地方……』的口哨，不敢走進寓所，打門口走了過去。穿西服的好像正在看我，我覺得他那種緊張的樣子，有點可疑。走了一段，又轉過頭來一看，見他還站在那裏，望着我這一邊。那天晚上，我就住到一個同志那裏去。那是一個有經驗的同志，據他判斷：第一，監視人不會有那樣子緊張的；第二，剛搬過去不到幾天，沒有任何預先的調查就來監視人，也是不會有的事。第二天派人去調查，果然沒有什麼事。但是，無論如何，爲了立刻就可應付突然到來的迫害，預先準備好第二個步驟，是非常必要的。在第二次聯絡的時候，我把這件事託付了笠原。

工作很快地就恢復了。因爲伊藤芳最近非常積極，我就讓她接替了太田的工作。在壓迫猛烈的時候表現積極性的人，是爲數不多的。她是高等學校的學生出身，但經歷了長期的、雖然是流動性的工廠生活，她身上已經沒有一點過去的氣味了。這個女人自從被迫過『非法』的生活以來，總是深入在工廠裏工作，曾經被捕過好多次，這就鍛鍊了她。有些人在轉入祕密狀態以後，開始了街頭活動，就脫離了現實的工人生活的環境，伊藤所走的却是與他們完全相反的道路。伊藤每次被捕，警察就把她母親叫來，把她交



給母親。每次母親把她領回家，便對她說：「這次你可別出去了！」可是不到半天，伊藤又從家裏跑出來，開始秘密工作了。可是每次母親一接到警察局的通知說是女兒被捕了，叫她去領，總是喜歡得很，對警察局再三道謝。第三次也許是第四次回家的時候，伊藤偶然和母親一起到澡堂去洗澡。她想到工作越來越重要，以後再被捕也不會那樣容易放回來，這次一起洗澡，心裏暗暗地有和母親告別的意思。可是在澡堂裏，母親發現坐在自己面前的女兒的裸體，動作顯得非常困難的樣子。原來她受過幾次很重的拷問，身上滿是青黑色的傷痕。據伊藤說，自從母親看見了她的身體，就立刻對女兒發生同情，同時開始理解了。母親憤怒地說：「警察局把我女兒弄成這個樣子，我再也不能向他們低頭了！」以後，伊藤每逢交通費、生活費發生困難，沒有辦法，託人去向母親要錢時，母親以前雖說過不回家就不給錢，現在却要兩塊就給四塊，要五塊就給七、八塊。還囑咐說：「不要惦記家！」母親還對每個去見她的人說：「只是爲窮人做點事，就把一個無罪的姑娘打成這個樣子，一定是警察局不對！」——假如連自己的母親都爭取不過來，怎麼能够把工廠裏那麼多的各種各樣的人組織起來呢？如果在這句話中包含着很多的道理，那麼，伊藤這種人就是證據。伊藤爭取羣衆的方法，實在令我佩服。只要一有空間，她就到淺草去看歌舞，去看國產電影，或是讀無產階級小說。她能够很適當地立刻把這

些看過的東西當做話題，運用到羣衆工作上。〔這是題外的話：伊藤有着動人的美貌，就是不開口，男工們在下工的時候，也常常拉她到白木屋分公司或者松坂屋這類百貨公司去，買各色各樣東西送她。她也就很沉着地、很好地利用了這種機會。〕

她雖然是一個很能聽取別人意見的爽直的女子，但是，對於她自己從幾十次經驗中獲得的工作方法，却顯得像一塊石頭似的頑固。現在，很需要像她這樣的女同志。尤其因為倉田工廠裏八百名工人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女工，她的意義就更大了。

除了倉田工廠的工作之外，我還在「地方委員會」擔任工作。「鬍子」的被捕，幾乎已經確實了，我又得接過他的一部分工作。這就突然忙起來了。但是因為自己的住處已經確定下來，又脫離了工廠生活，我可以充分訂定我日常生活的計劃，能比過去更集中精力去工作了。

在工廠的時候，可以知道工廠裏每天的動態，及時地把這些反映到第二天的傳單上。現在這工作是由須山和伊藤負責了。最初，我擔心離開工廠以後，對許多情況會發生隔膜。但是因為能和須山他們保持密切的組織聯系，不但沒有隔膜，而且非常有意思的：離得遠些，倒相反地發現了須山和伊藤（連過去的我也在內）往往被眼前小事奪去全部注意，看不見事物進一步的發展。那時雖然好像是看得很精細，其實可以說只是從一個

固定的框子裏坐井觀天罷了。當然，這是因為我現在是處在便於展望的地委會的工作崗位上。因此我明白了過去擔心會脫離實際，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我最先注意到的是：在一個有八百多工人的工廠裏，只有四五個黨員在拚命（完全是拚命）活動的現象。當然，如果沒有這四五個黨員拚命活動，全體工人是動不起來的。但是爲了使這四五個人的活動能夠推動全廠的工人，就必須具體研究怎樣和工廠裏的羣衆組織結合起來（或者去建立一個這樣的組織，在那裏邊去工作）。如果不去考慮一個實際的計劃，結果也只不過還是那四五個人的，沒有一點發展性的，唱獨腳戲的工作。——實際上，臨時工中的女工們，說是好不容易大家認識了，很快地就要各自分散，「碰碰衣袖也是前生的緣分」。正要組織一個臨時工的「交誼會」之類的團體。臨時工和正式工之間，由於工資和待遇不同，感情很不好，這是工廠當局故意製造出來的。他們之中也有些「互相往來」結成朋友。但這不過是一兩個例子而已。如果支部懂得怎樣努力把這種自發的東西擴大（組織）起來，並且在這裏邊（而不是只在自己的四五個人裏邊）做工作，那麼，趁最近六百多人就要解僱的時候，把全廠工人發動起來，決不是不可能的。

尤其因爲倉田工廠是一個製造防毒面具、降落傘、飛機外殼的軍需工廠，戰爭時期，在這種工廠裏的組織工作的重要性是用不着說的。戰爭一開始，我們就把組織重點放到

軍需工廠（其中主要是金屬和化學工廠）和交通工業（這是運輸軍隊和軍火的）上，這也就是我和須山、伊藤打進倉田工廠去的原因。只是我們全是臨時工，不到半個月就會被解僱，必須在這個時期以內，至少讓組織扎下根，因此爭取正式工人是十分必要的。這樣，使我們在被解僱以後，能夠從外面和留下來的組織保持密切的聯繫，毫無障礙地繼續我們的工作。我們就決定採取這樣的方針：不管在怎樣小的問題上，要經常使正式工和臨時工互相接近，使他們結合起來。同時，那些臨時工在這裏被解僱以後，就得另找別的工廠，因而這些人是會到各種各樣的工廠裏去的，這就是散佈了『種子』。所以直到最後，也決不能離開每一個臨時工。——我們必須在被解僱以前的極短的時期裏，做好這些工作。

兩三天以後，和須山在街頭聯絡的時候，老遠就看見他很怪樣地搖擺着兩條胳膊走過來了。他一有什麼事，總是做出這種樣子，好像他等不及見了面再慢慢地談，先在行動上表現出來。我想：大概是出什麼事了！本來規定的是在另一個小胡同的拐角上再一起走的，可是我剛拐進一條小胡同，須山就急步地跟在我身後叫了我一聲，說：

『太田有信來了！』

我想：果然不出所料。

太田的信是在監獄裏託一個流氓帶出來的。從倉田工廠到電車道這一帶是『妓院街』。在電車道兩邊的小胡同裏，都是一排排有圓形小窗的妓院。每到晚上，這兒就成了夜市，非常熱鬧。這一帶地方有一些叫做『某某組』的某某人的流氓們橫行着。一個綽號叫做『瘋子』的，因為訛詐罪被N警察局抓去了，偶然和太田住在一個監房裏。當這個『瘋子』要放出來的時候，太田就託他帶信給我們所認識的T。

太田的報告裏說：警察找我找得很緊，連我戴着闊邊眼鏡都知道了，說是稍微花一點錢就立刻能抓住我。所以希望我充分注意。

聽了這話，我說：

『就是因為太田什麼都說出來了，他們才要抓我的。』

『是呵，你戴沒戴闊邊眼鏡，如果特務們沒有看見過你，怎麼會知道呢？』須山也笑了。

太田寫這信是想叫別人認為他的行爲是對的。更要緊的是，我們很想知道太田在警察局裏到底說了些什麼，說到什麼程度。我們必須根據這點立刻考慮出一個對付的方法。我想太田這麼一來，一定很快就可以出來，對這樣態度的人，必須十分注意。

然而在工廠裏，只因為太田是從做工的地點被綁走的，就引起了不小的激動。大家

認爲過去散傳單的也許就是他，發生了一種親切的感情。每次發生事情以後，常常被工頭們叫做『賣國賊』的可怕的共產黨，原來就是太田；原來以爲共產黨是在看不見的遠處，不料却是每天和大家在一起拿着熨斗熨降落傘的那個太田；大家覺得出於意外。『太田從來都關心我們女工的事。他現在被捕了，我們就用工廠工人的名義，給他送點什麼東西進去吧！』伊藤芳立刻用這種辦法宣傳了『太田事件』，募集了一些錢和日用品。有七個人拿出了錢，其中也有一個據說是喜歡太田的女子。伊藤芳從太田這件事上聯系到傳單和工廠裏的工作，結果她爭取了八個女工。她有長期工廠生活的經驗，知道在哪些事情上爭取羣衆。而且在降落傘工場做工的幾乎全是婦女，她們對太田是頗有『好感』的。伊藤也適當地抓住了這一點。她從那八個人當中挑選出幾個最積極的，用『倉田工廠女工』的名義，到警察局去送了褲衩、襯衣、夾衣、帶子、手帕、手紙，還有一塊錢現款。警察局叫那些女人等了好一會，又出來說太田很感謝你們的盛意，不過因爲他自己有顧慮，所以不願接受這些東西，叫她們帶回去。沒有經過這種事的女人又和同去的四五个婦女把這些東西拿回來了。伊藤從前被捕的時候，她是有過被警察耍這種愚弄手腕的經驗的，就又到警察局去了一次，硬把那些東西放下了。——後來她從須山那裏知道了太田的情況，簡直把她氣壞了。

太田這種人，也許認爲自己的變心和屈服只是他個人的事，却不知道這會在許多工人的心裏罩上很大的暗影。那傢伙是個人主義者、失敗主義者、叛徒。他也說出了警察們所不知道的我的工作部署和我的以後的行動，這就使我和倉田工廠的同志們在今後的工作中，遭到十倍的困難。——我們就是這樣不只是從敵人，而且還從自己內部的蛻化分子那兒遭到交叉砲火的。這天我的交通費不多，就步行着回來了。在路上，我的神經變得異常敏感，看見每個人都好像是特務。我不斷地回顧着身後。由於太田的「口供」，那些傢伙爲了要抓住我，一定會在這個地方嚴密警戒的。「鬍子」從前說過：他們抓住我們一個人，就可以領到五十塊賞錢。那些傢伙貪得這種賞錢，一定熱心得不得了。——可是，想到這樣心神不定，對環境失去注意，常常容易發生危險。我可不能被人逮住。我就到一家點心舖裏休息一會兒，然後就回家了。

我們，是沒有所謂退路的。我們全部的生活都獻給了工作，這跟做公開工作的人不同。在這樣的情況中遇到這種叛變行爲，使我們全身感到了憤怒和憎恨！現在，我們沒有可以稱爲『個人生活』的東西，因此我們是用全生命（如果可以用這樣的說法）去憤怒和憎惡的！

我似乎氣糊塗了。平時我出入寓所的時候，總是要和老太婆招呼一聲的，今天連這

個也忘記了，一直上了樓。一坐在桌子前邊，嘴裏就罵了一句：

「混蛋！」

在這以後，我和笠原很快就親密起來了，連自己也覺得奇怪。不論什麼事，凡是她辦，她總是給我辦好。因為太田的叛變，我決定在最近遷移到別的地區去，但我不能自己到處去找房子，就託了笠原。同時，我想到了和笠原同居。這樣對於切實地、長期地進行秘密活動，也有方便。

一個男子單身住在寓所裏，不到那裏去工作，而且每天一到晚上就出去，——這就够叫人懷疑了。在工廠做工的時候，就沒有這個問題。特別是有時一晚上要有三四次聯絡，在兩次聯絡中間的空隙裏，不能總在外邊轉來轉去，只好又回到住所裏來。呆一會兒再跑出去。這種時候，老太婆總是做出疑心的臉色來，好像表示：這傢伙到底是靠什麼吃飯的呢？查戶口的警察來的時候，她一說這種情況，便有立刻被發覺的危險。

笠原是在公司裏做事的，早晨，在一定的時間出去。如果兩人住在一起，人家見我天天閒盪着，就會想到我是靠老婆的薪水過活的。社會上只信任有固定職業的人。——於是，我就去問笠原：能不能和我住在一起？聽了這話，她又突然睜大了眼睛看着我的



臉。可是，她什麼話也沒說。過了一會兒，我要她回答我。她還是沉默着。這天，她到底一句話也沒說就回去了。

第二次和她見面的時候，笠原跪坐在我面前，她從沒有在我面前這樣坐過，兩肩向前，兩手放在膝蓋上，身子是硬直的。想起我那次住在她的宿舍裏，第二天清晨，一走出門口，她就像男子似的爽快地大聲叫着：『啊——啊，賊老婆子！』現在，這種女人氣一點也看不見了。我驚奇地看着她。

我們談了一些事情。說完之後，她就露出了很不安的樣子。兩個人都避開剛才說過的話，極力把這話往後拖着。什麼都談完了，我終於又提起了那件事。這才知道，原來她是下定決心以後才來的。

這以後，我們就一塊兒搬到新住處去了。這裏離倉田工廠雖然遠了一點，但是因為須山和伊藤還是可以乘電車的『身份』，可以請他們上這邊來。這樣能夠節省一些交通費，也少些路上的危險。

#### 四

須山有事到我家附近的時候，常常順便到我母親那兒去。他告訴母親，我的身體很

好；回來後，再把母親的近況告訴我。

我離家是很突然的，連自己的母親也不能告訴，就祕密起來了。那天晚上六點鐘左右，我照例出去和一個同志聯絡。那時，我雖然也正在做非合法的活動，但同時還參加一個反動工會當會員，廣泛利用合法的地位，以工會內部反對派的姿態來工作的。那一天，在大點鐘會面的那個同志對我說：和我在一起工作的F突然被捕了，原因雖然不清楚，但我是直接和他發生聯繫的人，必須立刻轉入祕密狀態。我一下子呆住了，在我和F的關係上，他知道我不僅是一個反動工會內部的革命反對派，同時還有『老頭子』的關係。當時我要回家去安排安排，準備一下再走。我以為這種餘裕總還是有的。可是那個同志——就是『鬍子』——說：

『別在這兒說笑話了！』

他好像說笑話，却非常認真地說：『絕對不能回家去。有什麼事要準備，可以託別人去做，沒有辦法，還是馬上穿着隨身衣服就走吧！』而且還笑道：『這又不是假期旅行！』『鬍子』是少數能夠用溫和的口氣說出堅決果斷的意見的人。他舉出了一些例子：有的同志因為無處可去，想『也許今天晚上還不要緊』，又回家去住，終於第二天一早就被捕了。也有爲了處理一些要事，沒有充分考慮到自己正在被追捕的危險，一出門就被捕

了。他沒有說爲什麼就不行，只是舉出一些相似的事實做例子。這大概是因爲他有過各種經歷，這一類事情他知道得很多。

我借了『鬍子』身上僅有的五塊錢，就跑到朋友夫婦的家裏去了。——後來聽說就在第二天清早，果然有警察廳和S局的四個特務，到我家去捉我。母親事先一點也不知道，大大吃了驚，告訴他們說從昨晚出去還沒有回來。其中一個『頭子』，說我大概是聞風逃跑了。

從此我就沒有回過家。須山到我家去的時候，母親好似自己的孩子回家似的，把他讓到裏屋坐下，端出茶來，並且目不轉睛地看着他的臉。弄得須山搔頭挖耳，十分發窘。他把我從家裏跑出去以後的情況告訴了母親，話頭一停，母親就趕緊問：『還有呢？還有呢？』母親一直夜裏都睡不好，她眼睛紅腫，兩頰深陷。腦袋不住地搖搖晃晃，脖頸又細又嫩。

最後，母親問他：『安治得幾時回家呢？』這句話把須山問住了。幾時？一看母親那細細的脖頸，他怎麼也說不出真話來，他說：『噯，不會要很長的時間吧。』

我的母親對於我幾次被捕，在拘留所裏渡過的幾次「二十九天」，也已經習慣了。尤其在前年，我在監牢裏住了八個月，母親還常給我送東西去。因此對我的工作已經能够理解了。只是她還不明白爲什麼我現在不像過去那樣坦率地任警察捉去，她擔心我在逃跑以後再被捉去反而不好。

也許我讓母親過分傷心了，但我還只能用我的永不退却的行動來表示對母親的愛情。我知道，六十歲的母親逐漸和我接近，她所經過的內心的痛苦的鬥爭，恐怕比我們自己去做這種工作還要困難得多。我母親原是個鄉下的貧農，連小學也沒有進過。可是，當我在家的時候，她却開始學起字母來了。戴着老花眼鏡，彎着腰，把腳伸進裝着腳爐的被子裏，在被上放一塊小木板，把我寫廢的稿紙收在一起，在稿紙的背面，用鉛筆做起功課來了。我笑着問她：「你打算怎樣呀？」前年，我在獄裏的時候，她因爲不會寫字，一封信也沒有寫給我，她想起來就說：「這件事心裏感到很難過！」我出獄以後，母親看出我更加深入到革命運動中去了，以後一定還會被抓去，即使不被捕，因爲那次是保釋出獄的，判刑以後還得進去，爲了準備我再入獄的時候好寫信給我，母親就開始學習識字了。在我進入秘密生活以前，母親寫的字雖然是又大又不整齊，但是都能讀得出來，這使我很驚異。——母親問須山：「能不能見一面呢？」須山說還是不見面好。

母親就說：『那麼連信也不能寫麼？』我聽須山這樣告訴我的時候，想到母親說這話的心情，深深地受了感動。我難過起來了。

須山在我家要走的時候，母親把夾襖、襯衣、褲衩、襪子交給了他。然後，又讓他再等一等，就到廚房裏去。在那裏忙活了一陣，過了一會，拿出五個煮熟的雞蛋。她讓須山對我說：『毛錢能買三四個雞蛋，要我挑新鮮的買些，一定要吃雞蛋。我和須山伊藤一塊吃着雞蛋的時候，須山笑着說：『伊藤，我們一個人只吃一個吧，要不然老太太該埋怨我們了！』伊藤裝着好像不懂他的意思，只是擦着眼睛。

後來，須山又要到我家去，我要他明白告訴母親：四五年當中，我是不能回家的。我不能回家，並不是因為我們幹左翼運動，而是那些資本家的走狗——警察們不讓我回去；不要恨我，要恨這不合理的社會！與其含混下去，倒不如讓她明白了，會從這裏產生出抵抗的力量。我知道有的同志被捕以後，家裏的妻子或母親聽人家說這是因為共產黨的關係，就有這樣說的：我的丈夫或兒子本來不是那種『壞人』，是因為警察硬給加上個罪名，說他是共產黨。這就會從家屬的口裏流露出，共產黨就是『壞人』，共產黨

就是犯罪的了。我的六十歲的母親，是不應該這樣想，也不應該這樣說的。我的母親五十多年的生活，都是在貧困的深淵裏渡過來的，如果把道理詳細地說給她聽，我想她是能够理解的。

據須山說，母親默默地聽了這些話。可是她問：她已經六十歲了，萬一有了病，說不定今天明天就會死，那時候也不能回來一下麼？須山沒想到她會說這種話，不知怎麼回答她才好。我聽了以後，叫須山去對她說：那時候也不能回來。

「不行呵，我不能那麼說。」須山爲難地說。

我想到這樣說對母親是殘酷的，但這是不得已的。我們應該從一切的事情上，使母親對於統治階級堅持終生的仇恨（事實上，母親的一生就是這樣的）。我囑咐須山要對母親反覆說明：如果我連在母親臨死的時候也不能回家，這全是統治階級逼我這樣做的。——可是，當我後來見到須山的時候，我心裏很亂，我問他：

「怎麼樣？」

「我照你說的，對她說過了——」

須山說我的母親近來瘦了，臉色也有點發青。她只是問須山：能不能見一次面？

我忽然想起了渡政的事，渡政過秘密生活的時候，他的母親（現在她已經不只是

渡政一個人的母親，而是整個無產階級的母親了）向同志們說：「不能再見到渡政了嗎？」同志們就回答她說：「不能再見到了。」於是我把這事對須山說了。

「這個我知道。不把你住的地方告訴她，找一個地方跟她見一次面吧。」實際上，須山看見了我母親的那種樣子，心裏已經受了感動。

「可是，特務正在找我，不這樣做已經够危險了，萬一出了一點事呢？」

可是，我終於被須山說服了。決定了一個我們從來沒去過的地方，讓須山用汽車把母親接出來。到了那天，在約定的時間，我就到那個很小的飯館去。母親在桌子對面，離開桌邊，拘束地坐着，臉色很沉靜。我一見母親穿着出門時穿的最好的衣服，忽然從心裏產生了說不出的感情。

我們並沒有說很多話。母親從桌底下拿出一個小包袱，拿出了香蕉、枇杷，又拿出煮雞蛋。須山立刻就要走，母親非得把雞蛋和香蕉塞在他手裏不可。

過了一會，母親斷斷續續地說了一些話：「比在家的時候臉上倒胖了一點，我放心

◎ 渡政即渡邊政之輔（一八九三—一九二八年），日本共產黨的優秀領袖之一，金屬工人，德國球一  
的親密戰友。在日本的工會運動史上，有卓越的功績。一九二八年被害於台灣。

了！』她說近來幾乎每天夜裏都夢見我非常瘦弱，被警察抓住了，被警察『責備』着（母親總是把拷問叫做『責備』）。每天都是從這樣的夢裏醒來。

母親又說在茨城的女婿，以後會常常來照顧她，叫我不必惦记她。話說到這類事情上去了，我就把過去託須山對她說的話，又親自說了一遍。母親笑着說：『我明白！』我忽然注意到母親的心神不大安定。好像坐不穩的樣子，說話也很不從容。——後來，母親終於說了：沒有看見你的時候，我一天到晚坐立不安，一下子見着了，可是一想到別因為這次見面倒把你抓去，便覺得心神不定了。現在還是回去吧。果然。母親一看見別的桌子上來了客人，就小聲說：『那個客人好像還不要緊……』看見了另一個客人就說：『那個人相貌很兇！』相反地當我不自覺地跟在家裏一樣的大聲說話時，她就叫我放低點聲音。母親說與其這樣提心吊胆的見着你，還不如不見你——只要知道你精神很好地在工作，我心裏就好得多了。

母親要回去的時候說：我今年六十歲了，雖然還想再活二十年，活到八十歲，可是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說不定明天就會死；知道在我臨死的時候你回家來是很危險的，那麼，臨死的時候一定不讓你知道。對於普通人，也許沒有比在臨終見不到自己的兒子更大的事情了，何況六十歲的母親！母親這種決心，使我感到震撼全身的激動。我沉默



着，也只能沉默着。……

走出來的時候，母親在我身後說：我一個人可以回去，你小心些，回去吧。接着，忽然用很不放心的聲音說：

『你的肩膀有點毛病……』她說，『認識你的人從後邊就能看出你，你得把搖着肩膀走路的習慣改掉了才好……』

『大家都這麼說呢。』

『是吧，立刻就看得出來。』

一直到分別的時候，母親還自言自語似的說了好幾遍：『立刻就看得出來。』

從此，我把過去殘留下來的，個人生活的最後的退路——和母親的血肉關係也切斷了！在以後若干年之內，在新的世界到來之前（我們就是爲了這個而鬥爭的），我將不能和母親在一起過日子了！

最近，『鬍子』來了一封信。

原來『鬍子』在I警察局呆了五天，以後就被送到K警察局去了，在那裏過了一個

『二十九天』。一個和他在同監房裏住過的朝鮮工人，把他的信送到和須山伊藤有來往的「那裏」，我們這才知道他的消息。信裏說：他是在自己的住處被捕的，到現在也還不知道原因。又說：重建我們的陣營決不能急躁，不能冒進，也不能有機會主義。在焦躁、冒進、機會主義等字樣的旁邊，他還特別畫上了圓圈。

看了這信，我和須山、伊藤都覺得我們又急躁，又冒進，又沒有做多少工作，真是可恥。

『鬍子』家裏，有父母和弟兄們。由他的家裏也寄了一封信給我（只用在我們之間稱呼的名字）。信上說：他自己只準備給他們一張『白紙的供狀』，對一切問題的回答，只有『不知道』三個字。大家看了這信之後，都說：

『這一下子，可把太田帶給我們的一肚子彘扭都掃乾淨了！心裏暢快了！』  
我們確信，不管在我們的隊伍中出了怎樣的叛徒和機會主義者，永遠是有一條正確的、鮮明而粗大的紅線，貫穿在正當中的。

『鬍子』常常說：對於敵人的訊問，如果回答了一句話，那就是違反了我們的『一言不答』的鐵的紀律，就是對敵人要我們回答的『紀律』屈服了。共產黨員絕對不許違反黨的紀律。——現在，他是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表現出來了。

「芳，你知道蕭瓦洛夫嗎？」須山問伊藤。

「馬克思主義者呀！」

「又是貼報簿麼！」我笑了。

「蕭瓦洛夫被捕的時候，七個月裏，堅持着，沒有回答一句話。他說：——作爲一個平凡人，不向敵人作任何陳述，這就是我堅持七個月的從不違背的戰術。」

聽了這話，伊藤說：

「可是，不久以前，在一個無產階級劇本裏寫着一個女同志，連敵人本來就知道的自己的名字和原籍都沒有說，一直堅持到最後，出來了。——這個人比蕭瓦洛夫還厲害呀！」

她好像是在說她自己的事情。須山裝着一種遺憾的樣子，用力地搔着腦袋。

於是，我們就把「作爲一個平凡人」，對於敵人的訊問一言不答的行爲，做成我們支部會議的決議。這個決議不只在我們一個支部，並且還要報告給上級黨機關，使它能夠成爲一個全黨的決議。

以後，又從送到T那裏的信中知道，「鬍子」又從K警察局被轉解到Q警察局去了，在那裏，一連三天從早到晚，由七八個人輪流拷問。把兩手綁在背後吊在特務室的天花

板上，下邊就由拷問的人拿毛竹板子毆打。氣絕了，就給他灌水，反覆幾十次。但他還是一句話都沒有說。

見了這信，伊藤說：「那些東西實在可恨！」她自己就有兩次在警察局裏連短褲都被脫去了，特務們用毛竹板子的尖頭向她身上亂戳。

同志們的英勇的鬥爭，鼓舞了我們。當我有一件工作非得做到天明不可，而我又非常渴睡的時候，我就想到那些正在監獄裏的人，忍耐着堅持下去，一想到他們，睏一點算什麼呢！——這時候，監獄裏的同志們怎樣了呢？正在被拷打吧？那麼，趕快把這件工作做完呵！這樣，我們的日常生活就和監獄裏的同志們的生活連結在一起了。獄內和獄外雖然不同，但同樣都是對統治階級的鬥爭，沒有什麼差別。

## 五

伊藤在臨時工當中組織了八九個人。——倉田工廠六百臨時工將被解僱的消息，越來越確實了。從共產黨散發傳單以後，大家都已經看得很清楚，就連十塊錢的津貼也是不會給的。工廠的內部漸漸不穩起來，正和我們的方針一致。「交誼會」之類的團體都建立起來了，比我們原來所想的還要容易。

女工們從工廠裏回來的時候，大家都已經很餓了。伊藤和辻、佐佐木（辻和佐佐木兩人是大家當中品質最好的）就把大家帶到點心舖子或是麵舖裏去。大家被一整天繁重的工作累壞了，盡挑好吃的吃。因為這兒已經聽不見工廠裏的機械的吵鬧聲，大家都好像要把一天的事情一下子說出來似的，高聲嚷叫起來了。

伊藤她們是這樣做的：她在女工們中間已經被叫做『那個』了，所以她在點心舖裏說一些『那一類的話』，並不是很不自然的。辻和佐佐木担任『敲邊鼓』，和女工們在一起，有時甚至故意對伊藤說些反動話，好給伊藤的話起個頭兒。可是，一開始的時候，常常配合得不大好，在一個問題上來回繞圈子。要不就是露出二個人串成一氣的馬腳來，一走出舖子，這才發現每人都出了一身大汗。經過一次兩次就逐漸巧妙起來了。『敲邊鼓』的敲得很巧妙，把一些女工們不知不覺地吸引過來了。所以，『敲邊鼓』的人，必須清清楚楚的瞭解那些覺悟不高的普通女工們思想裏存在一些什麼偏見，什麼想法。

女工們到了一塊，所談的不外是一些誰和誰的情形有點可疑，誰和誰有了交情，誰沒有勾搭上誰等等。伊藤和我見面的時候，說了這樣一個故事：防毒面具車間的正式工吉村給降落傘車間的一個叫阿絹的女工寫了一封情書，信上說：『想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和你說幾句話！』女工們一出工廠，就都嘀咕着這件事，來到麵舖裏，大家也一直

談論這個。說是阿絹一接到這封信，就開始在臉上塗起濃濃的白粉來，還在衣帶上繫了一個小圓鏡子，一邊做工，一邊不停地照鏡子。有一個叫阿繁的聰明的女工說：阿絹流着眼淚跟她訴苦，男的說要找一個安靜的地方說說話，可是工廠裏整天都是乒乒乓乓的，一下了夜班就是九、十點鐘了，人已經累得要死。而且那人是每天七點就下班的，兩人又不能一塊走。……聽了阿繁的話不知是誰說了一句：『真可憐呵！』於是『敲邊鼓』的佐佐木趕緊說：『咱們真是連和情人談句體己話兒都不行！』大家說：『是呀，』『真是這樣！』

『勞動時間這麼長，要想和情人在一塊兒談談，首先就辦不到！何況偶爾還想跟他看看電影呢！』

大家全笑起來了說：『這是真話！』

『一天掙這麼幾個錢也不行喲！』

『是呵！時間不減少，工錢不增加，戀愛也談不成！』

『工廠真是够刻毒的！』

『我們那兒的工頭，今天還跟我們嚷呢：——現在是什麼時候，你們知道不知道？現在是戰爭時期！你們得把自己看成軍隊的一部分，要拚命去幹活才行！要是戰爭擴大

起來，就給你們跟當兵的一樣的餉金，你們也得照樣幹！這是爲國家呀！——那個禿腦袋畜牲就是這麼說的！」

這使伊藤也吃了一驚。不知不覺的，話題却已經從戀愛轉到工廠的待遇問題上來了。這時候，連那『敲邊鼓』的也驚奇起來了。大家的話，一點也不勉強地、自然地變成對工廠的攻擊了。

我聽到伊藤說了這件事以後，心裏想，確實是這樣的。戰爭一開始，到處都在殘酷地增加勞動強度，女工雖然和男工同樣勞動（或者勞動得更多些），對她們的剝削却更加殘酷。現在，如果在經濟上得不到解決，的確是連戀愛也談不成了。即便不聽大家這樣說，本來也是可以感覺到的。

最近，伊藤想領着這些女工去看一次有意思的戲。伊藤、辻和佐佐木預先估計到大家一定會要求到淺草去看歌舞劇，或者想去看片岡千惠藏的戲，所以決定想辦法讓『敲邊鼓』的先去鼓動一番，想辦法讓她們到『左翼劇場』去。

聽了伊藤的報告以後，我對她說了我的看法：她那個團體裏一定要吸收男工參加，叫她和須山聯系一下，這不會有什麼困難。即或有一個男工加入，也會使大家的情緒不同一些。更重要的一點，是這個團體不要成爲僅僅是臨時工的組織，一定要吸收正式工

參加。伊藤同意了我的意見。

我們爲應付即將發生的六百人的解僱，準備停止完全是『工廠新聞』性質的傳單，使傳單和工廠新聞分開，各自獨立起來。

我叫須山去考慮『工廠新聞』的題名，他抽動着鼻子說：

『就叫做戀愛的降落傘，好麼？』

工廠新聞決定叫做防毒面具。因爲我已經不到工廠去了，就從S那裏接過編輯工作來。由我担任收集伊藤和須山的報告，並根據這些報告寫成稿子，送到印刷所去。印出以後，伊藤早晨很早就去取出來。我和須山、伊藤每天取得聯系，調查工廠新聞的影響，根據羣衆意見，立刻在下一期的防毒面具的編輯工作上反映出來。

聽了須山和伊藤的報告，知道工廠方面正在時時刻刻研究着對策。現在工廠裏對於十塊錢津貼和解僱的事，很奇怪的，一個字也不提了。顯然是有了什麼第二步的陰謀。這就是想法子既不發給十塊錢的津貼，又能夠順順利利地解僱工人。所以，一定得瞭解他們將採取什麼手段，把這種手段向羣衆揭露出來。假使我們繼續採取過去那樣的方法，羣衆就會離開我們了。我們的戰術必須準確地適應對方那種資產階級的狡詐手段。根據過去我們失敗的教訓；一開頭，總是我們壓倒了敵人；可是敵人一旦摸熟了我們的一套



做法，便反過來向我們進攻。我們往往不去研究敵人的做法，照樣搞自己的老一套，這就使敵人佔了上風，到最後關頭來打擊我們。

伊藤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她說：『目前情況有點不同！』但是還不知道這不同到底在什麼地方。

第二天，須山拿來一張小紙片：

### 佈告

由於全體同人共同努力，使本廠事業得以順利進展。本廠當局與全體同人同深欣慰。如所周知，軍隊不能單獨作戰。如我工人不努力製造防毒面具、降落傘及飛機外殼，我軍即不能戰勝敵人。因此，工作中雖有某些困難，吾人亦應具有與在敵彈中血戰之軍隊同等之精神與自覺。

爲促進全體同人之自覺，特進此一言。

廠長

『我們的工作進入第二階段了。』須山說。

工廠方面已經把這樣的話散佈到工人中間去了：工廠本來打算按照當初的規定，到時候就裁去那六百個臨時工；可是現在改變了方針，要挑拔二百名成績優秀的臨時工轉爲正式工，希望大家努力工作。

我和須山心裏明白了。很明顯的，工廠當局散佈這種『風聲』，是爲了破壞在宣佈

解僱時有組織的反抗。另一方面又利用這個『佈告』，使工人們抱一種空虛的希望，爲了也許能成爲正式工而拚命幹活，好讓他們加緊剝削。

須山抄來了那個佈告，把事情真相暴露了。這樣，我們就完全明白了工廠的第二階段的戰術。

我和須山、伊藤，每天取得聯繫。不過，在街頭聯繫，很難考慮出精密的對策。所以，我們約定每星期一次，三人在一起坐下來談談，我們把這個叫做『座談』。決定由伊藤找地方。須山和伊藤的生活還是『合法』的，這是好的，但是我是一個固定場所坐上兩三個鐘頭很危險，必須提高警惕。我們便決定當我和伊藤在街頭聯絡的時候，問明白『座談』場所，先調查她所決定的場所周圍的情況，證明確實安全以後，到那一天，讓她和須山先去，我選另外一條道到那裏去。我到那裏的時候也並不立刻進去，先察看一下在事先指定的某一個地方，因爲如果這個場所沒有發生異常情況，伊藤就預先在那兒做好一個安全『記號』。

一天晚上，風中帶來一股被白晝陽光晒熱的瀝青氣味，我拿着要傳給須山和伊藤的旗（黨的機關報）和宣傳小冊子走出門去。我們約定在這天晚上『座談』。走到街上，看見街角上站着兩個警察。在另一個拐角上，又站着三個。這不成！我想，我手裏還拿

着東西呢。一邊想今晚的「座談」怎麼辦，一邊猶猶疑疑地往前走。走過派出所前邊，也有兩三個警察站在那裏。令人吃驚的是那些警察都把帽帶扣在下頰底下。中途往回走是不妥當的，沒有法子，脚步有點躊躇起來了。派出所門口的那個警察，好像正在往我這邊看。——我馬上裝着傻里傻氣的神氣，把帽子拿到手裏，迎上前去問道：

「這邊是S街嗎？還是……」

警察用奇怪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是S街！」

「呵，謝謝您！」

我就往S街那邊走。過了一回兒會頭一看，注意過我的那個警察已經背過身去，兩個人正在說話了。畜生！我摸着旗和宣傳小冊子，心裏想，可惜，白把五十塊錢放過去了！

爲了防備萬一，我到底又折回家去了。第二天一看報，才知道原來出了一件殺人案。

我們常爲了無關的事「遭殃」。不過，他們也常常找這類事作藉口，實際上是爲了來一次所謂「搜捕赤色分子」。他們每逢來這麼一手之後，就在報紙上報喜似的叫着：「得到了意外的副產品。」這就是證明。聽S說，在外國雜誌上這樣登過：在日本，完全沒有夜間出外的自由，沒有在咖啡店裏暢談，不受警察干涉的自由……這是事實，而且還是

特別爲了進攻我們。

我經常注意報紙，讀遍報上的每個角落。看看在早晚出去的時候，我要去的方向有沒有出什麼事。尤其是關於逃脫很久了的殺人犯和強盜被捕獲了的新聞。不只讀自己訂的報，還常叫笠原去買來各種報紙，注意閱讀。有一次看到一則關於一個隱藏了七年的犯人的新聞，在某些點上對我很有用處。我每天早晨讀報的時候，總是先選這一類的記事開始。

——我和現在一起做地下工作的S和N之間，訂了一個「不被逮捕五年計劃」的社會主義競賽，我們的口號是「五年計劃六年完成」。把這個計劃實行到六年七年，年頭愈多成績就愈好。因此日常行動不能依賴偶然性，必須在科學的考慮上進行活動。笠原常從舊書舖裏買新青年來叫我看，有時也認真閱讀一些偵探小說。

第二天是約定聯絡的日子，須山一見了我就叫：「好啦，好啦！」他以為我（我從來沒有失約過）被捕了。他說在見到我的臉以前，一直是被不祥的想像弄得非常不安。我向他說了昨天碰上的意外的事，又笑着說：

「不是說五年計劃六年完成嘛！」

「話雖那麼說……」

因為我昨天受了殺人案的「連累」沒有能够去「座談」，須山今天又準備好了，地

點是伊藤的住處。因爲一兩天內她就要搬家，所以決定就在她那兒。那兒住了七八個房客，條件是不大好的。所以決定我要小便的時候，不要上廁所裏去，可以使用伊藤生病時候買的那個便壺。如果上廁所碰見別的房客，正好又是認識的人，那就糟糕了。

『轉過臉去！』我對他們兩人說，就走到牆角那裏，用那個玻璃便壺。伊藤聳着肩笑着。『好騷！』須山故意堵着鼻子說。

『麒麟牌的鮮啤酒呵！』我說着，便把便壺往牆根裏一推。他們兩個大笑起來。

倉田工廠快要來一個最後攻勢了。從伊藤的報告裏可以看出來。今天，和伊藤在一起幹活的一個降落傘女工，正在看早晨散發的防毒面具第三期，突然有一個四天前新進廠的男工把防毒面具奪了過去，還把那個女工打了一頓。以前防毒面具或傳單拿到手裏以後，大家只是留神工頭，對同伴們是不注意的。因此碰上了這個意外。伊藤看了這情形，知道情況有變化了，她就去調查那個男工，後來從掃除女工那裏知道，原來那男工是這個區裏的青年團員，又是在鄉軍人，是在戰爭開始的時候特別僱來的。注意了這

● 新青年是當時日本的一種專載偵探小說的雜誌。

● 青年團是當時日本的一種反動青年組織。

個男工以後，發現他在第一車間和第三車間裏都有同黨，常在做工時間離開枱子到別的車間裏去，工頭看見了也不說什麼。最近，又發現他跟工廠裏原來就有的（從前沒有什麼活動）大衆黨系「僚友會」裏的清川、熱田那些人也有來往。

奇怪的事是，過去一直沒有活動的「僚友會」，現在也開始有了些活動。第二件事是，不知從哪裏又散佈出這樣的空氣：現在是國家的非常時期，我們的工作責任重大，大家應該比其他的產業的工人更加自重，更加緊張，所以倉田工廠裏有軍籍的人應該成立一個「在鄉軍人分會」。廠長似乎是贊同的，這些話好像都是由他們特別僱用的人散播出來的，一兩個「僚友會」的傢伙再從旁吹噓。顯然，他們是計劃好的，如果從工廠方面出頭來幹，效果就薄弱，所以，他們要使這件事看來似乎是工人的自發行動。

問須山時，他說他那方面還沒有明顯的表現，但他想了一想，又說：最近在午間休息的時候，總是有人跑來跑去大聲地談論戰爭。他說他聽了伊藤今天的報告以後，他過去以爲工人們所談的關於戰爭的那些話、關於經濟狀況的那些話，只不過是大家從什麼地方聽來的；只不過再加上一點他們自己的幼稚的想法就跑來得意的辯論一通，或者說些灰心喪氣的話罷了；但現在仔細一想，才知道並不是這樣簡單，似乎確是有人在有計劃地進行煽動。——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來，沒有疑問的，敵人是開始全面出擊了。

因此我們要戰勝敵人，必須正確地、科學地認清敵人的情勢。現在，他們已經知道僅僅從上而下強制管理工人是不夠的，在上工下工的時候使用便衣警察去監視工人也是不夠的。他們已經想到了第三步，認為必須打進工人內部來破壞我們的組織工作。因此『僚友會』也發動起來了，還在工廠裏擴大青年團和『在鄉軍人分會』的組織。在這樣一個軍需品工廠裏成立這樣的組織，是具備着特別危險的便利條件的。——我們必須承認，現在是在三條道路上和敵人的勢力對峙起來了。

須山說現在工廠裏到處談論戰爭的那些人，已經不說戰爭是爲了『忠君愛國』，也不說『中國人令人可恨，所以非打他們不可』，他們說這次的戰爭不像以前的戰爭那樣，是爲了在佔領區設立三井、三菱的大工廠，而是爲了開闢『無產者的出路』。打下滿洲以後，可以把資本家排除出去，由我們自己建立一個王國，那時，國內的失業者就可以湧進滿洲去，這樣，就可以使日本國內沒有一個失業者。俄國就是沒有一個失業者的國家，我們也必須跟俄國一樣。所以，這次戰爭是爲無產階級的戰爭，我們應該一切爲了戰爭，爭先恐後拚命地勞動。

『僚友會』的清川和熱田却說：這次戰爭是大資本家爲了在殖民地進行新的剝削的戰爭。——每到午間休息的時候，就這樣和在鄉軍人和青年團的職工們大開辯論。可是

清川說：不過這次戰爭，在另一方面對無產階級是有利的，比方說金屬和化學軍需品工廠，出現了空前盛況，簡直不管有多少工人也不够用。從戰爭股票的暴漲，也可以看出來（不知從哪裏聽來的），帝國火藥公司的股票，戰前只有四塊錢，現在已加了一倍多，值九塊錢了。石川島造船公司的股票，從五塊錢暴漲到二十五塊錢。做子彈用的銻，從二十塊左右的行市漲到一百塊。德國雖然在世界大戰裏敗得一塌糊塗，可是克虜伯工廠却比平時獲得十倍以上的純利。我們的生活也可以借打仗的光得到好處，所以一般的反對戰爭是不對的，應該盡量利用戰爭。——這就是他們的意見。雖然一開始的時候，他們和青年團、在鄉軍人們互相爭論，到最後，他們的意見就一致了。

從午間休息時工人們的情緒上看來，他們對於青年團員所說的『滿洲王國』之類的话，覺得好像跟做夢一樣，不知道相信好，還是不相信好；也只相信到這麼一種程度：如果真能那樣，那倒不錯！但是對於清川他們說的話，臨時工們倒是同意的。如果當兵去，也許會死，也許會成殘廢，而結果『滿洲王國』是否真能那樣對自己很有好處，也實在沒法設想。可是因為發生了戰爭，自己才能在長期失業中找到職業。雖然臨時工沒有津貼，還強制加夜班，和正式工幹一樣的活而工錢却很少，心裏不滿意；但是，自己也到底是受了打仗的好處。



清川連自己是一個號稱爲『工人政黨』的『大衆黨』的黨員也忘記了，像個資本家似的只是關心股票的價錢，考慮戰爭的好處。但是像他這種意見，却巧妙地抓住了工人們（尤其是臨時工）對眼前利益的關心。

伊藤說她自己和她的朋友，還沒辦法在女工面前揭穿這種想法的內幕，使女工們對事情有正確的理解，在這方面，還很笨拙，不能適當地反駁她們。她說：『恨得牙癢癢的，就是沒有辦法！』我認爲伊藤說的話是實在的。我們對於這次戰爭的本質，是了解得很清楚的，但是不能自滿；結合大家日常生活來說明這個問題，使每個人都瞭解，都還做得非常不夠。列寧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在戰爭的問題上，連革命的工會也往往有錯誤的認識。加上現在又有清川和熱田之類的人在努力妨礙工人們去瞭解，這就越發困難了。

公司現在又常常把五點下班延長到六點、七點，而且不發加班費。最近，幾乎每天都是這樣。臨時工雖說不滿意，心想不幹，但又怕將來改不成正式工，只好留下加班。不過，要幹到六點就一定得帶上飯食，可是又不給飯錢。爲了幹到六點鐘，自己還得賠上飯錢，等於減少了一天的工錢。公司雖沒有明說要降低工資，實際上這幹法正是降低工資。大家非常憤慨地說：『這是胡弄人嘛！』伊藤的降落傘車間的工人，在加班到六

點的時候就這麼說：『要是連飯錢也不給，實在忍受不了！』

不但這樣，最近，工作時間雖說還是十個鐘頭，可是工作跟從前也完全不同了。爲了想改正式工，大家幹得特別起勁。以前，幹活的時候還能和身邊的人說說話，像阿絹那樣把揣在帶子裏的鏡子掏出來照照，現在連用袖子擦擦汗的工夫都沒有了。降落傘車間是使用電熨斗的，人都讓汗濕透了。汗拍塔拍塔落到展開了的降落傘上。從生產額上看來，公司賺到的利潤比以前高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工資却還是和從前一樣。實際幹活的工人們對這點是非常明白的。不過，一牽涉到自己的生活，就戰爭是戰爭、幹活是幹活的完全分開來想了，不知道工廠裏對待工人越來越苛刻，正是因爲戰爭的緣故。因此，只要使他們瞭解這兩者互相結合的關係，他們就會本能地看破青年團員的詭計了。

從上邊說的事，就可以很清楚地瞭解：工廠支部應該把新的鬥爭重點放在什麼地方。爲了斷絕清川、熱田對臨時工的影響，應該想法讓臨時工把『反對增加勞動強度』、『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的要求提到『僚友會』去。這樣，他們一定要說出種種道理，結局他們一定不會站在鬥爭的前頭，還會設法去胡弄工人。那時我們就立刻抓緊機會，當着羣衆的面，叫大家認清，他們並不是站在工人一邊的。我們把這個作爲支部會議的決議，決定在防毒面具的編輯方針上，對工廠內法西斯和社會法西斯，進行新

的、不斷的揭露。

須山一邊用火柴燒着零碎寫滿了字的紙片，一邊說：「這樣看來，你死我活的決戰階段，就要到來了！」

「對了！要戰勝他們，必須有科學的、正確的方針，有把這方針在任何情況下貫徹到底的決心。如果法西斯出動了，我們就跟他們拚命！」

我這樣一說，須山便笑着說：

「對於我們，工廠不是城堡，而是戰場！」

「這又是誰的典故呀……」

「是我自己的！」

——後來，我出席黨的地方委員會組織的會議時，會上傳達了這樣一個報告：最近，在官營的N軍火工廠裏，不但守着荷槍佩劍的憲兵，還在各個工廠的重要部門裏混進了穿工人服裝的憲兵。那裏的黨支部最近被檢舉了，就是那些「穿工人服裝的憲兵」幹出來的。這種「工人」，表面上故意裝出很進步的樣子，實際上是最危險的。倉田工廠本來不是軍火工廠，還沒有派憲兵來，但事情再進展下去，應該估計到：憲兵也會來的。

看錶還只有九點鐘。我們就把身子躺下，隨便閒談起來。我看了一看伊藤的梳粧台，這梳粧台比笠原的漂亮多了，連黃色的、紅色的，甚至綠色的脂粉都齊全。

「嗨，不得了！」我說。

「討厭的傢伙。」伊藤知道了我的意思，站起來說。

「伊藤用了紅色、青色、黃色的化粧品，搖身一變，天天夜裏耍她迷人的手腕呢！」

須山笑着說，「那兒還有許多三越和松坂屋的包裝紙，全是進貢的！真是幸福的人哪！」

工廠裏，只要是看得上眼的漂亮女工，就能够從工頭、主管人和同事的男工那裏收到禮物，或是被帶到松坂屋去，或是一起上點心舖子去吃東西。只要是看來有培養前途的普通男工來邀她，伊藤就一道出去，她自己當然也主動去邀他們。因此她在廠裏總是把臉打扮得漂漂亮亮。男工們也是一樣，只要穿得乾淨俐索，相貌長得遠端正，就有女工們像須山所說的那樣「直接而具體地」跟在他們後頭打轉。

「最近怎麼樣？」我問。

須山摸着下巴笑嘻嘻地說：「一向就是不景氣！」

「小芳還是老樣子麼？」

我手托着臉，沒有轉過頭去，只用眼睛看着她問。

「什麼？」

她反問了一句，可是她聽懂了我的意思，臉上的表情（在一剎那間）稍微變了一下：

「早呢，早呢！」立刻恢復了平常的神情，這麼回答說。

「聽說要等革命成功了再談。我們這些男同志雖說是馬克思主義者，可是一結了婚，三千年來的潛在意識就會作怪，也會把小芳當做奴隸看待的！」須山笑着說。

「須山是說他自己呢！」伊藤的臉色幾乎是冷冷的說。

「因為沒碰見好同志吧？」我看着伊藤說。

「你看我怎麼樣？」須山骨碌一下子抬起上半身來說。

「你太不自量了！」我說。

「誰不自量？我麼？」須山笑嘻嘻地說。

「這小子，覺得自己不錯呢，真不害臊！」

三個人同聲笑了。——我把我周圍的人都想了一遍，能配得上伊藤，和她生活在一塊兒的實在沒有。如果她真的找到自己的對象的話，那一定是一個優秀的同志。這樣，

兩個人在一起生活，互相幫助做黨的工作，一定是很幸福的。——我和伊藤一直像這樣在一起工作，可是從來沒想到過把伊藤當做這個問題的對象。這正說明伊藤的嚴肅是不知不覺反映到我們的情緒上了。

「我負責幫你找個好樣的！」

我帶着開玩笑的口氣，認真地說。那時候伊藤用一種苦惱的臉色望着我……

回家的時候，在街上僱了一輛出差汽車。汽車好像是抄近道走的，不斷地拐過黑暗街道，突然開到一條熱鬧的明亮的大街上。我裝做有點醉了的樣子，把帽子覆在額上。

「到哪兒啦？」

一問，說是銀座●。這有點討厭。這樣熱鬧場所，對我不方便的。我什麼也沒說，裝做不明白的樣子，又把帽子往前拉了一下。可是，我有多少個月沒見着銀座了呵。屈指一算，四個月了。我不時看看道路的兩邊，比我從前來的時候，大大變了樣子了。我不知不覺地熱心地看起大街來。我曾有過類似的感情，那是前年住監牢的時候，到預審庭去出庭，手上戴着手銬，坐在監牢的囚犯車上，從裝着鐵欄杆的窗子裏看見半年不見的新宿●的行人。我看着一幢幢的建築物，一塊塊的招牌，一輛輛的汽車，同時也想看

見行人中的每一個人。我用很大的注意力去看：行人中，有沒有一個認識的同志。記得回到監牢的單人房後，眼睛痛了一兩天。

汽車開到第四條街的十字路口，鈴聲叮鈴鈴響起來，對面的電桿上亮起了紅燈。我乘的車就停在停車線上。車窗外走過各種各樣的行人。也有人一邊走還一邊往車裏望，我心裏着急了，爲了準備萬一，就用手握住另一面的車門把手，把臉搭拉到胸口上。一會兒鈴聲又叮鈴鈴響了。我透出一口氣，鬆開了把着車門的手。

我望着那些慢慢散步着的無數的行人，想到在我的生活裏是完全沒有散步的，我不能隨便往外蹦躑，就是打開窗子坐在屋子裏，也怕被外邊的人看見我的臉呢。在這一點上，我跟拘留所或單人房裏的同志是沒有什麼分別的。有些地方甚至比那些同志更難受，雖然我還能出來走走，但是却不得不竭力抑制。

這在我是有自覺應該這樣做的，但對於和我一同生活的笠原來說，却是很難受的。有時她也想和我一同到外面散散步，可是不能一同出去，她心裏就好像不大高興了。笠

● 銀座是東京最熱鬧的街道。

● 東京的鬧市。

原每天白天上班回來，我總是已經出去了。因為我是白天休息，光用夜晚的時間工作的。因此兩個人一塊兒坐在屋裏的時候就很少。這樣一個月、兩個月過下去，眼看着笠原心裏一天比一天不愉快。她好像也知道那樣子是不行的，在極力克制自己，可是時間久了，到底克制不住，就發洩到我的頭上來。一個完全不能過個人生活的人，跟一個有大部分個人生活的人住在一起，是很困難的。

『自從跟你在一起，從沒見你在家裏呆過一晚，也沒一塊兒出去散過一回步！』  
笠原終於說出這種顯然的糊塗話來了。

爲了彌補我們之間的裂痕，我想拉笠原參加同樣的工作，而且試了好幾次。可是自從兩人住在一起以後，我發現笠原不是適合做這種工作的人。她是個感情膚淺的，沒有韌性的女人。我對笠原說：『你是個氣象台！』有一點細小的事就犯急躁，要不，就相反的自暴自棄起來。有這種性格的人，是不適宜做我們這種工作的。

當然，一天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脫離工人生活的打字員的工作上，回來之後還要做飯，星期天還要趕着洗兩個人的衣服，實在沒有空間；而且生活的負擔又很重，情形是很可憐的，並且她自己也沒有從這裏振作起來的意識和勇氣。我雖然要她振作，但她並不跟着我來。



我在半路下了汽車，走過兩個電車站，然後走進小胡同，回到家裏。笠原臉色蒼白，沉着臉斜躺在屋子裏，一看見我便說：

「人家把我裁了！」

這事情太突然了，我站在那裏默默地看着她。

——笠原雖然沒有幹什麼事，可是公司裏却有人說她是「赤色分子」。於是主任就到笠原的保證人——從前的房東那裏去瞭解她。馬上發現她早已不住在那裏了。我的住址是絕對不能讓任何人知道的，所以她在公司裏報的住址還是從前的那個。因此公司覺得這事更加奇怪，趕緊就把她辭掉了。

直到現在，我都是靠笠原的薪金付房租做零用的。爲了不使工作受到妨礙，好容易用這錢維持了生活，她被裁掉，實在是個很大的打擊。本來可以向那公司多少要一筆「退職金」，但因為我的存在是不合法的，就不能硬去要這筆錢。實際上，公司主任已經暗示過她：「不把你送到警察局去，就算便宜你了，你還是老老實實走開吧！」

我們的生活立刻發生了困難。更壞的是：這件事立刻讓樓下的老太婆知道了。如果不能讓房東信任，人家就會猜疑你。這不僅僅很糟糕，而且還很危險。所以不管怎樣先得付房租。可是，一付房租，就剩下兩三塊錢了。兩三塊錢是立刻就可以花光的。笠

原爲了找職業，每天得出去，我一天平均也得出去四回。我一向坐車子去的地方，現在就走着去。因此，從前聯絡一次前後需要三四十分鐘的地方，現在一去一來就得兩個鐘頭，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了。我向同志們「募捐」，每遇見一個同志就要來五分錢或者一毛錢，因此須山的「神田伯山」也沒有了，弄得我只有苦笑。須山和伊藤兩個人很關心我。他們說自己過的是合法生活，沒有錢還不至於有很大危險，而且又能到別的地方去借，便從每天的工資裏拿出五毛一塊的給我用。我認爲這種錢是不能隨便用的，就拿來做出去工作時的交通費，吃飯方面就努力節省了。茄子很便宜，五分錢能買二三十個，把它放在樓下老太婆的糟髮裏，早、午、晚三頓就光吃茄子。吃了三天，身體馬上受影響了，一上樓就氣喘、流汗。

肚子餓，身體又疲勞，每天老那麼一種菜，弄得一點食慾也沒有了。後來，就用開水泡飯吃，用力閉着眼睛往嘴裏扒。這還得要飯才行。有時一夜得進行三次聯絡，沒有錢只得步行，只在早晨吃一頓飯，實在覺得太慘了。有一次，我想也許會從我要見面的同志那兒弄到一點麵包錢，不料見面以後，完全失望了。那個同志臉色很過意不去，對我說：他現在就去會見M同志，也許他拿得出麵包錢，叫我一塊兒去！我實在熬不住了，M又是我熟識的人，就這樣跟着他去了。在M那裏我找到了麵包和牛油。M笑着說：

「你這樣一個大人物，爲了一片麵包放心大胆地跑到這裏來，要讓人家抓去了，可不得了啊！」我說：「抓去了我就說：先給我麵包！」說完這話就笑起來了。——可是心裏却想：讓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可實在有點不妙。爲了穩穩當當長時期進行工作，不遭逮捕，不能像這樣毫無道理地焦躁。

我決定採取最後的手段。這天，我回家去，鼓起勇氣對笠原說：去當咖啡店的女招待好麼？她正爲了每天跑出去找職業，又疲勞又生氣。一聽見我的話，她突然把身子一扭，顯出陰鬱厭惡的臉色。我從她臉上把目光移開。她頑固地沉默着，我沒有法子，也只好不做聲了。

「你又說這是爲了工作吧？……」

笠原並不看我，却忽然用安靜的低聲說了一句，也不聽我的回答，突然高聲地叫了一聲：

「當妓女我也去！」

因爲笠原總是不願跟着我走，就認爲她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爲我犧牲。如果說是犧牲，那麼，我幾乎是把全部生涯都犧牲了。每次和須山、伊藤會面以後往回走的時候，想到他們是回到普通世界，普通的自由的生活裏去了，我却依然要回到不許有一點疏忽的、

不寬暢的生活中去，因而難免在心裏引起一種感慨。而且，一旦被捕，就有四年、五年的牢獄生活在等待着我。但這樣的犧牲比之千百萬工人和貧農在每天的生活裏的犧牲，又算得了什麼呢。我從我自己父母當了二十多年貧農的痛苦的生活，是完全能够瞭解的。我知道我自己的犧牲，是爲了解放這幾百萬人的大犧牲所不可缺少的一種犧牲。

笠原對這樣的事還不能有痛切的瞭解，更壞的是對什麼事全都認爲是「爲我犧牲」。「你是個了不起的人，像我這樣的糊塗蟲，是應該爲你犧牲的！」——然而很明白的，我是一個完全沒有個人生活的「我」，那麼，爲「我」犧牲是什麼意思呢。我是組織中的一員，我有義務服從組織，我們的工作是解放全體無產階級的工作，我必須把這種工作進行到底。因此我一定保重我自己，並不是因爲我偉大，也並不因爲我是英雄。——只知道個人生活的笠原，就只能用個人的尺度來理解別人。

我耐心地把這些話對笠原說了。她默默地聽着。這晚上她一句話也沒說，很早就睡覺了。

## 七

晚上，給防毒面具寫了稿子，整理了給地方組織的報告，又讀了一些由負責發行的

人那兒轉來的積壓了一個時期的宣傳小冊子和資料，工作到很晚，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十點鐘。——覺得樓下有什麼人來了。對於我的敏感自己也覺得驚奇。我好像忽然張開眼來，把頭從鋪上抬起來，果然是警察來了，是來調查戶口的。我早已寫好了原籍姓名等等交給了老婆子。免得碰上來調查的時候把我叫出去。我聽見警察在對老太婆仔細詢問一家的事情，像調查罪犯似的。我感到這樣子有些不對頭，一邊尖着耳朵聽，一邊把裝文件的皮包下了鎖，不出聲地換好了衣服。——「有房客麼？」警察問。「有房客。」……老婆子回到起坐室去，好像是我寫的紙片給了警察。

「這上面沒有寫以前住在什麼地方呵，」……「是夫婦麼？」「什麼時候報戶口的？或者還沒有報？這個寫得不清楚。」老婆子說了些什麼。「丈夫沒有職業麼？」……「現在，在家麼？」——我想：來啦。「出去了！」聽見老婆子這麼說。我透了一口大氣，心想還是把所有的錢都付了房租是做對了。「那麼，回頭再仔細問一問吧。」警察這麼說着，好像走了。我想：還好還好。在被裏坐下時，就聽見警察一邊開門一邊說：「這些日子，赤色分子有很多租房子住的，要當心呀，……」我嚇了一跳。老婆子「啊」地反問了一聲。警察又說了幾句話。大概老婆子還不懂什麼叫「赤色分子」吧。

這樣調查戶口，我覺得不是一件平常的事。這一天，出去聯絡回來的時候，在鄰街

上看見一個警察拿着戶口冊走進一家小舖子裏去。走了不遠，在同一條街上，又看見兩個警察拿着戶口冊從一條小胡同裏走出來。我會見S的時候，對他說了今天早晨調查戶口的事，他說：現在全市好像都在挨戶調查出租房子的人家，要當心才好。我看見這樣大張旗鼓的調查，也覺得必須注意。

反動派不知已經說過多少遍，說共產黨已經崩潰了，連根都拔掉了。在他們所有的大報紙上大肆宣傳，企圖讓什麼也不知道的工人相信這話，以便切斷黨在羣衆中的影響。可是，這樣宣傳了一陣以後，黨還是到處在活動。不管用什麼方法來矇蔽羣衆，還是一點效果也沒有。特別是在這戰爭時期的「五一」節，八月一日的國際反戰日這樣大紀念日的前夜，他們正想盡辦法想把黨的力量剷除乾淨，因此把他們所有的國家權力來一個總動員。開口造謠中傷，誣蔑黨，扼殺人民的聲音，可是事實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見證，表示了黨是他們的強有力的敵人。聽說外國的一個報紙上，把日本的黨叫做「小而戰鬥的黨」。（S和須山的「神田伯山」不同，這些事他是知道得很多的。）S在告訴我的時候說：「這個小而戰鬥的黨，跟一個國家權力是對等的，不，我們的勢力還在對等以上呢！爲了想剷除這個「小而戰鬥的黨」，那個比我們大幾百萬倍的組織正在使盡一切的力量。因此，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必須以這樣的「自豪」來進行工作。」他說：「這

是不同尋常的「自豪」。』聽了這些話，我們高興得不得了。爲了把這種自豪貫徹到底，決不能讓他們逮住！

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住處是很危險的。我和須山、伊藤指望倉田工廠在「五一」節那天活動起來，結合六百個臨時工解僱的問題，只要我們再加上一把勁，是有充分把握的。如果在這以前被逮捕了，那就等於背叛自己的階級。聽說S這幾天在枕頭旁邊準備了粗大的手杖和草鞋睡覺。我注意到這個，爲了實現還沒有實行的在晒台上準備草鞋的計劃，就在回來的路上買了一雙。

從跟須山會面時的情況看來，知道「搜索赤色分子」的事不僅僅在工廠外進行。——那次我去會他，遠遠望見須山臉上纏滿着繃帶，跛着腳走過來，不覺吃了一驚。「挨揍了！」他告訴我。他不時在繃帶上邊按着臉，傷口在發痛。可是怎麼辦呢，時機是這樣緊迫，斷了聯絡是不行的。所以還是跑來了！我們決定不在外邊走着談話，一同走進一家點心舖裏。

工廠因爲僅僅靠外邊的警察沒有什麼效果，便把精川、熱田的「僚友會」和在鄉軍人、青年團的力量也組織在內，進行工廠內部的「搜索」。可是在防毒面具和傳單上，連這件事也給揭露出來以後，他們好像着了急。兩三天以前，工廠舉行了一次徵募慰勞金

的活動，這件事本來已經過時了，但倉田工廠在這時候來這麼一個活動，目的是想借此統一工廠內部的空氣，使所謂「赤色分子」沒有「侵蝕」的餘地。他們的所謂「忠君愛國」等等，如果不符合他們的利益，那他們是不會關心的。給工廠獻策的，據說就是在降落傘車間裏那個打過看防毒面具的女工的、穿工人服的在鄉軍人青年團員。

須山打算抓住這個機會，使羣衆擺脫清川、熱田的「僚友會」的影響。伊藤也贊成這個主張。「勞農大眾黨」自稱是工人的黨，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但其實完全不是「工人黨」，對帝國主義戰爭也只是在表面上反對罷了。——要大家認清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須山和伊藤加入了「僚友會」做普通會員。無產階級爲了揭露資產階級一切欺騙政策的本質，進行困難的反戰工作，首先就得和那些看去好似自己人的「僚友會」那類右傾機會主義做鬥爭。須山便找清川，問他能不能爲慰勞金的問題開一個「僚友會」的定期全體大會。同時準備通過在自己和伊藤影響下的同志，把徵募慰勞金的問題，在羣衆中揭露出來。

全體大會開會的時候，想不到青年團的工人也來參加了。我們重視「僚友會」，是因爲這裏臨時工雖然很少，可是正式工却很多。在伊藤和須山的羣衆中，只有一兩個正式工。雖然一再強調正式工的重要性，但因爲困難很多，所以並沒有什麼成績。加入「僚



友會』的，除了兩三個人以外，大多數人都是糊塗的。因此如果在這些人面前顯示出來，到底是清川對還是須山對，那是很有可能把一些人拉到我們這邊來的。

從戰爭開始，半年多以來『僚友會』只開過一兩次會，會員當中也有人說些不滿的話。須山在大家面前一開頭就說：在有這許多工人和農民被送到前線去，日常生活這樣緊迫的時候，『僚友會』沒有認真地開過一次會，這是對階級不忠的表現。——當時就有五六個人說：『對……』說完了，這幾個人又私下裏嘀咕起來。我和須山都有過在反動工會裏做革命反對派的經驗，很明白這種在說了『對』之後的嘀咕咕的情況。聽到這裏我就笑了。須山也笑了，可是他立刻叫着：『痛，痛！』在繃帶上面按着臉。他善於抓住特徵模擬別人的樣子。

說到『慰勞金』的時候，清川說：到滿洲去的兵士都是工人和農民，是我們自己人。所以由於無產階級的兄弟關係，給他們送慰勞金，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大家剝着手指甲沒有作聲，聽他說話。我們的同志，在工廠裏受資本家的剝削，到前線去犧牲在敵人的砲火底下，保護我們同志的只有我們自己，所以我們應當徵募慰勞金去慰勞他們。——清川這次說話，大家覺得很對。

伊藤見了這情形，困惑地皺皺眉頭。

「是真的麼？——」她問了一聲。

「僚友會」裏有十四五個女工，常到會的只有兩個。這次由於伊藤的張羅，到了六個女工。在「僚友會」裏還是很難得的。因為在「僚友會」上從來沒有女工發言，大家的目光立刻轉到伊藤的臉上了。

「聽了清川說的話，似乎很對，不過很像陸軍大臣的訓辭……」大家開的笑了起來。

「不論是清川或是別人，都明白這次戰爭不是爲我們的，結果還是爲了資本家。如果是爲我們工人、失業者、貧苦的農民去打仗，我們寧可剝光了衣服也要把所有的錢都拿去慰勞的，——可是，事實並不是這樣。」

伊藤這樣說了之後，青年團的工人突然插進嘴來打攪。於是，須山也插了進去，他就用着清川的話說：「我們工人在工廠裏受資本家的剝削，資本家用不着我們的時候就把我們隨便趕出去，一到打仗，就先把我們送到戰場上去，無論在哪裏都是爲資本家去犧牲，——所以，如果要出慰勞金，就得叫資本家去出。」

大家聽他這麼一說，臉上就表示了「這也說得不錯！」的神氣。

「他們要我們出錢去慰勞，就是欺騙我們，讓我們相信：打仗不是爲他們打的，是

爲了全體人民打的。這是他們的詭計！」

伊藤緊接着又說了「赤色慰勞袋」的事。又說自從戰爭開始以來，大家的的生活都很苦。這一來，清川他們已經沒法子還手了，清川的「僚友會頭子」的威望，在大家面前，一下子就打下來了。青年團的職工們，也跟着完蛋了。可是，這種社會法西斯的本質，真正的戲是不在大家面前唱的，只在背後才露出他們的本來面目。如果僅僅以爲這樣就一切順利了，那是大大的錯誤。

開完會回來，兩三個青年團的傢伙對須山說：

「你這小子好厲害，你來！」

一走進小胡同裏，就突然撲過來，打起來了。

「他們是三個人，我沒法子只好挺着挨打。」

須山說着，笑了。

他挨打之後，馬上通過伊藤要她向昨天集會的「僚友會」的會員報告青年團的這種卑劣手段。這件事最明白地表示出來，到底誰對誰不對。

和須山見面後一個鐘頭，我又會見伊藤，她說：大家都很關心地问：爲什麼爲了慰勞金的事打起來呢？她把打人的事告訴了他們，順便把慰勞金的真相向他們揭發了。因

此她很高興。——我們正擔心不能使大家充分瞭解慰勞金的問題，但是，事實上大家關心的不是大道理，工作已經够苦，還要他們出錢，他們就說：「這簡直要我們的命了。」結果，出乎意外地，募捐慰勞金的活動完全失敗了。須山因為挨了一頓揍，在工廠裏的威望突然增高了。職工們知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大家都很感激須山。可是，須山也開始被工頭注意了。伊藤說：說不定會有危險呢。

「這回募集慰勞金，看來也許是工廠爲了要發現工人裏頭的赤色分子，特意佈置出來的，……」

我說，也許是這樣。

於是，她說：

「我們有點上當了——」

我覺得這話不大像是伊藤說的。

「這不對，」我說。「我們已經在幾十個工人面前，證明了到底誰是正確的。同時，在「僚友會」裏面，造成了我們的影響，如果不放棄這種影響，把它保持下去，就會收到很大的效果。我們做工作，總是有犧牲的。到最後的決定關頭，一定會起作用。」

伊藤的臉馬上紅起來了。

「明白了！對，——明白了！」

她說着，帶着她所特有的深思的目光，輕輕地點了幾下頭。

我開玩笑地說：

「最後的笑才是真正的笑，現在先讓須山苦一點吧！」

伊藤也笑了。

接着，她說她帶着自己的小組去看了築地小劇場的戲。所有的女工說到戲就只知道「歌舞伎」（雖然她們自己沒有看過）和水谷八重子。這回看見男工女工都上了台，

在台上「吵吵鬧鬧」，不覺大吃一驚。看完以後，大家都說：「這哪裏是戲呀！」伊藤

問：「那麼是什麼呢？」她們說：「那是真事！」她又問：「有意思麼？」大家只是

「呵！——」丁一聲。可是看來却有了深刻的印象，後來就常常談到築地小劇場。常跟

伊藤在一起的一個身材很小、名叫阿君的，就這麼說：

「人家一說我是女工，我常常覺得害臊！可是，那戲裏的女工却很驕傲，我想，這是不真實的！」

她想了一想，又說：『在罷工的時候，我也能够挺起胸膛來幹！可是，一聽鄰居說我是女工，還是覺得很害臊。』

問她們什麼時候再去看，很多人都說還想去。因為看過的那個戲裏，有一個跟家裏的（所謂家裏是指自己的工廠）工頭很相像的傢伙被大家收拾了一頓。

伊藤裝做無所謂的樣子說：『反正我們早晚得解僱，老老實實幹也得不到津貼，不如像那戲裏一樣，大家來它一次罷工，把工頭治一治怎麼樣？大家都嘻嘻地笑了。』

『噫！……』她們互相你看我，我看你的說：『來一下子，有意思呀！』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商量用什麼法子把工頭好好教訓一頓，不知不覺就說出了和戲裏一樣的办法。

受了伊藤的影響，在她們中間又加入了三個『僚友會』的女工。因為這三個人多少呼吸過一些工會的空氣，常常坦然地使用那種伊藤她們平常不大使用的術語。這就在女工中間造成了一點隔閡。同時這幾個女工也有互相『摩擦』的地方。她們做出似乎很懂得左翼運動的樣子。——伊藤正在製造種種機會，想搞好她們中間的關係。她笑着說：『不能像小說裏寫的那樣順利呀！』

我們決定了『座談』的日期，由伊藤去找地點。越來越需要決定最後的對策了。

『你還在吃茄子？』

伊藤一邊站起來，一邊這麼問我。

「嗨，」我笑着說，「因為吃了茄子，膝蓋都發軟了！」

伊藤把手揣進衣帶裏，拿出一個小小的疊成四方形的紙包，我以為是報告，看了看她的臉，就放進衣袋裏。

回到住處，拿出來一看，原來是用薄薄的手紙包着一張五塊錢的鈔票。

## 八

笠原進了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決定要進去的時候，樣子確實是很可憐。搞革命的人，爲了生活去進咖啡店，到底是一件可怕的事。這種同志不管自己怎樣堅定，也很容易墮落下去。「氛圍氣」對於我們，正如水對於魚一樣重要。女同志爲了自己個人，或是爲了男女兩人一起工作，不致大家垮台，而上咖啡店，其結果也都是一樣的。何況笠原是一個沒有受過革命鍛鍊的人，當然更容易走到下坡路去。而且，她也沒有把全生命投入革命運動的決心，另一方面，我的組織工作，已到了必須堅持到底的關頭，決不能有半點傷感的情緒。

笠原開始到咖啡店去上班，工作又生疏又勞苦，直到深夜才帶着滿臉疲倦和不快的

神色回家。走進家裏，把手提包一扔，搭拉着肩膀坐在蓆上，一句話也不說；過了一會兒，坐到我的對面，把雙腳默默地伸在我的眼前。

「——？」

我看看笠原的臉，用手摸摸她的腳，已經腫得上下一般粗，分不清膝頭和腳踝了。她試着在蓆子上把腿彎一彎，膝頭便發出咯吱的聲響，叫人聽了難受。

「整天都得站着，真受不了呵！」她說。

我對她講了從前聽伊藤說過的紗廠裏的情形：女工們站腫了腿，跟不上機器，工頭在身後用皮鞋踢着幹活。……我說不要以為這種職業的痛苦是自己一個人的痛苦，只要自己一個人能夠逃脫就行了。應該把它看做這是束縛整個無產階級的痛苦。

笠原聽了我的話說：

「你說得對！」

我把笠原的嬌小的身體，抱在自己懷裏，——這是好久以來沒有過的事了，她閉下眼睛，身子一動不動。

以後，笠原搬到咖啡店去住了。開咖啡店的是一個女人，好像是人家的外室。她一個人照顧不過來，以為同樣是給飯吃拿了錢，就要笠原搬到店裏去住。笠原告訴房東只



說是回娘家去住些日子，就搬走了。女主人是一個高等師範或是女子大學出身的，英國話說得很漂亮。男的不只一個，似乎有三個，她輪流地住到男人那裏去，到早晨才回來。那些男人中有大學教授，有著名的小說家，還有電影演員。女人一回來就詳盡地敘述一番，一直描寫到細節，而且還加以比較，弄得笠原大為難堪。女主人講完了，就一直睡到下午三點鐘。我在早晨沒飯吃的時候，就到這咖啡店去。早晨，咖啡店裏幾乎沒有客人，笠原假裝做她自己吃的飯，填飽了我的肚子。開頭她還不願意這樣做，後來習慣了，就認爲『這樣的事也應該的』。咖啡店的廚房很窄，又亂又濕。我蹲在那兒，急急忙忙地吃飯。

『你這神氣真好看！』

笠原一邊注意着二樓上，一邊看着我的樣子，低聲笑着。

可是笠原的環境真是壞到不能再壞了。女主人過的既是那種生活，到有女人的咖啡店裏來的客人，不是喝完咖啡就走的，不少人是專門來和女人胡鬧的，她就得一一個一個的跟他們敷衍。當然這些壞東西是會滲進笠原的心裏去的。我並沒有把笠原全部放棄，一有機會我就給她送去一些書籍，盡可能的和她談談話。可是，她對一切事情比從前更沒興趣了，對什麼事都不願去花腦筋。

可是，繁重的工作完全把我綑住，和笠原的這種關係，也不可能保持下去了。倉田工廠的情況緊張起來，我只在要交交通費或是找飯吃的時候，才到笠原那裏去一下，幾乎不可能和她談什麼話。我發現笠原有時候臉色很寂寞。我靠笠原才能很好地進行日常活動。在這點上，應該說她對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曾對笠原說過這種意思，要她有這種明確的自覺，她才能完全掌握住自己，不致招來精神上的崩潰。這是很重要的。

漸漸的，連去要交交通費和找飯吃的工夫都沒有了，從三天去一次，到一星期去一次，再到十天去一次，次數逐漸減少了。「地方」「區」還有「工廠支部」的工作很繁重，往往一天要聯絡十二三次。早晨九點出去，常常一直跑到夜裏十點。回到住處，脖子硬得像根棒子一樣，腦袋裏針刺似的疼痛。好容易上了樓，就得一下子撲到蓆子上躺下來。這些日子，我都不能仰面朝天舒舒服服地睡覺。因為極度的疲勞，好像身體裏有什麼地方出了毛病，同軟弱的孩子一樣，只能伏着身子睡覺。我記得，我的父親在秋田縣鄉下種地的時候，從地裏回來，連滿是泥的草鞋也不脫，一下子就伏在房門口睡午覺了。他工作得太累了。因為地租太兇，他拚命去耕種村裏沒有人種的滿是石頭的荒地，想多少收點糧食，補貼生活。因此他的心臟出了毛病。——當我如果不伏着身體就睡不着覺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漸漸像起父親來了。但父親不去反抗地主要求減低地租，只想拚命勞

動直到把身體搞垮，來逃避地租。這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我却和父親不一樣。我和自己唯一的母親隔絕了關係，跟妹妹、弟弟，也斷了往來，如今把自己同笠原的生活也犧牲掉了，再加上，連自己的身體也正在壞下去——可是這不是像父親那樣爲了給地主資本家服務，而是爲了反對他們。

我連一點點的個人生活也沒有剩下了。甚至，春夏秋冬都成了黨的生活的一部分。連四季的花草、風景、天空、雨，這類東西都成了不是獨立的東西。天一下雨我就高興，因爲出去聯絡的時候可以打傘，人家就不容易看到我的臉。我希望夏天早早過完，不是因爲討厭夏天，只是因爲夏天衣服穿得少，我的有特徵的身段，（讓這種特徵去餓狗吧！）很容易被人看出來。一到冬天，我就想：『又多活了一年，可以多幹工作了！』可是東京的冬天天色過於晴朗，這是很不方便的。——自從過了這樣的生活，我不是對季節不關心，倒是以從來沒有想到過的方式，對季節非常銳敏起來了。這跟前年關在牢裏的時候對季節的變換特別敏感的情形又完全不同。

這是在不知不覺中養成的，是所處的生活環境使人在不知不覺中養成的。當我被警察搜索以前，雖然也同樣全心全力爲無產階級解放事業貢獻了自己，但那時仍有很多『個人的』生活。有時候和工廠中同一工會裏的人（這個工會是社會民主黨系統的反動

組織，我在那裏邊做反對派工作）談談閒天，到淺草或新宿去散散步……雖然也受工廠支部的嚴格的政治生活的限制，但是那些跟合法生活不可分離的『交際』生活，看看電影（近來我已完全忘記了電影的存在），吃吃、喝喝這類事情，確實也佔去了我生活中不小的部分，因此有時也使工廠支部的工作拖沓一兩天。那時，還有點朦朧的好名的思想，當可以抬高自己名譽的工作與工廠支部的工作發生衝突的時候，總是先做自己的事。雖然在以後的工作中逐漸改變了，但是還不能說是在過着作爲一個共產黨員的『二十四小時的政治生活』。這不僅是由於個人的錯誤，也因為所處生活環境的關係。意識的努力總是有限度的。當我斷絕了一切個人關係，置身在這種凡不屬於黨生活的個人慾望都被限制了的生活中時，那些我過去曾經努力去清算而又極難做到的事情，却很可驚地變得很容易地就能够做到了；它把我過去需要的一兩年的努力縮短到兩三個月就成功了。這種新生活開始的時候，曾經像小時候跟同伴們比賽誰能把頭伸進水盆裏最久一樣，感到過窒息一般的痛苦，那種難受確實是說不出來的。——然而究竟我還沒有在真正的困難中鍛鍊過。常常喜歡用和須山不同的『典故』的S，聽我說了『二十四小時的政治生活』，就對我說：『我們必須把自己鍛鍊成一個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時而不知疲倦的人。』

所謂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時，我起初不大明白這個意思。但當我一天必須有十二三回聯絡的時候，我就理解了它的意義。現在我的願望就是要使自己至少能接近這樣的生  
活——使個人的生活同時也成爲階級的生活。

倉田工廠使出了最後的花招，傳出要把若干臨時工改成正式工的風聲。爲了對付這一着，我們重新組織了力量。從在須山的影響下的羣衆中挑選了一個年輕的正式工，從伊藤的組裏挑選了兩個，其中一個是正式工，另一個是臨時工。我們把這三個人推薦給黨組織。我把他們的簡歷提交給地委組織部，被批准了。明確分配給每個黨員在工廠內分担的責任；萬一須山或伊藤發生變故的時候，後繼的人馬上就可以照預定的新部署進行工作，不使工作中斷一天。須山或伊藤假使出了事情，在工廠裏立刻就會知道，那時新的人就可以到須山和我聯絡的地點去。我們的會晤是鬥爭的司令部，如果斷了聯絡，不能在決定性的時刻裏及時的拿出對策和方針來，那就等於背叛了階級。因爲有人被捕而斷絕了聯絡，使工作不能順利進行——過去的這種做法，是完全從失敗主義的觀點出發的，好像我們本來沒有受什麼壓迫，完全沒有想到會被捕似的。有人被捕是很明白的事情，所以我們進行鬥爭，首先應該做好第二步第三步的準備工作。

事實上，從『僚友會』的毆鬥以後，須山的處境已經十分危險了。每天上工廠去，

他都做着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的精神準備。在工廠裏正在幹着活的時候，只要特務喊一聲：『喂，到這兒來一下！』就會立刻抓走，一切完事。可是發展組織的可能性正在高漲，他還是上廠裏去，雖然危險，但另一方面却有了在車間裏公開說話的某些自由，在羣衆中建立了威信。

快到月底了，工廠可能在三十日或三十一日就要裁工。說是要改正式工，可是一直沒有一點具體的行動，這就使工人們懷疑起來了。我們在防毒面具上指出了這是一種欺騙手段，他們用這種手段，一方面是爲了提高生產率，另一方面是爲了鎮壓大家的反抗。大家立刻明白了這個意義。可是大部分是臨時工，一旦發表了解僱的話，團結力是會鬆弛下來的，事情的成敗就得看這兩三天內的工作。

我們一直在傳單和報紙上，號召大家反對戰爭，一旦工人們在裁工問題上站立起來，就會以『童話一般的速度』教育工人，爲什麼要反對戰爭。尤其在這種製造軍用品的工廠裏，是能够引起政治性的鬥爭的。——現在首先應該把事情發動起來。

我下了最後的決心。

由須山和伊藤影響下的同志和新的小組分別擔任各車間的工作，同時舉行一次『反對解僱』的車間會議。爲了完成這件工作，決定由須山在工廠裏公開散一次傳單。——

伊藤的那個「點心舖小組」裏有一個女工，她的哥哥是倉田工廠的職員。從她的口裏知道了工廠已決定不是在三十一日（他們故意使人以為是在三十一日），而是在二十九日先發制人，宣佈解僱臨時工。據說在那一天，不但有警察，還要出動軍隊。所以，無論如何我們要在二十八那天舉行罷工，一定得由我們這邊先下手。

但是，須山最近似乎有被捕的危險。據伊藤的報告，她曾經有一兩次看見特務從事務所裏走出來，並且還在須山所屬的第二車間門前和工頭站着說話。這都是在這一兩天以內的事。自從太田被捕以後，廠裏仍然發現了兩次黨的傳單，和兩次防毒面具，對方已經毫不懷疑地注意了須山。一般人在說到共產黨的時候，不知道他到底在什麼地方，認為這是一種天上地下出沒無常的神仙或鬼怪，別人也是要他們這樣相信的。但是我們必須使他們明白，所謂共產黨，就是像須山那樣受到大家信任，終日和大家一起並肩勞動的人，使他們感到親切和信任。——爲了這個原因，我決定讓須山公開散發一次黨的傳單。這是最後的一次鬥爭，即使沒有須山，也得由另外一個人來執行這個任務。僅僅用隱蔽的方法，是動員不起羣衆來的。我們必須像蛛網一般發展祕密的組織，然後發動公開的鼓動。

我們決定開一次「座談會」來討論最後的對策。打算把這個方案在「座談」中提出

來，做出決定。——可是一想到須山，就覺得心裏難受起來。散發黨的傳單，雖然根據本人的鬥爭經歷輕重不一，至少得準備坐兩三年到四五年的牢。……平時我在外出的時候，總是把一切思索和空想都摺在一邊，一邊走，一邊留意周圍的環境（這已經成了習慣），可是今天，我忽然發覺我總是在想着須山。這樣把思想停留在須山的問題上是很不好的。對須山來說，如果他看明白我們當前的形勢，他就會理解這件工作是必須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除此之外再也沒有第二條路。如果爲了無產階級的解放非這樣辦不可的話，我們就不能存在任何工作以外的想法——比方說這種做法太『殘酷』了，太『無情』了……等等的想法。

可是一直到會面的地點爲止，一路上我的腦袋裏不時的出現那個常常突然用『典故』取笑我們的須山的臉，心裏覺得很不好受。

約會的地點是已經用過三次的須山的一個從前的酒友的家裏。在看不見腳的黑黑的外屋脫下木屐，把它揣在懷裏，向樓上走去，在斜射下來的光線中，望見了須山的臉。

伊藤身子靠在牆上，側坐着伸出了兩條腿，正在捫着自己的腳。我一進去，她好像用手攏了一下垂下來的頭髮，抬眼向我一望。我說：『上次，多謝了！』她沒有回答。伊藤到工廠去，總是抹脂粉的。可是在小組開會的時候，臉上從來沒有抹過粉，因爲沒有



必要。可是今天伊藤的臉却打扮得從來沒有過的美麗。

「伊藤同志剛剛「組織」了一個男的正式工回來——」

須山指着伊藤的臉，又說起他的笑話來了。

這種時候，伊藤總是沉默着。可是不知爲什麼，這時候，她却看了一下我的臉。

會議一開始，我就特別注意地聽須山的照例的報告。他已經按照前次小組會的決定，到各個車間去佈置了開會的事。看工廠方面的情況，最近兩三天，好像就是決定關頭了，因此，必須趕緊行動起來。

伊藤補充說：上次對我報告的裁工的事，表面上做出三十一日實行的樣子，實際大概二十九日就要動手了。從降落傘和防毒面具的交貨期來估計，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所以最晚在後天二十八日，必須進行決定的鬥爭。

意見一致了。現在的問題是這個決定的鬥爭應該採取怎樣的方式來進行。——須山想了一想說：「現在一切都準備好了，羣衆情緒正在高漲，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一鼓作氣的把羣衆鼓動起來！」

他停了一停又說：

「能不能一鼓作氣的幹起來，這是勝敗的關鍵了……」

「對。現在就是要有一個點火的人！——爲了八百個人！」

伊藤的臉上露出了少見的興奮。

「我，在最近——就在這幾天，心裏正有點着急。直到現在，我們曾經用了種種辦法去清算福本主義。●時代的關門主義，可是，它還是有殘餘的。現在我們不能一口氣鬥倒這個工廠，也許就是這個關門主義在作怪？」

須山又看着我的臉說：

「誰要是不能在羣衆面前做公開的鬥爭，就沒有方法完成任務。這是一個從量到質的轉變！我這思想不知是不是過「左」了？」

須山在這句話上特別用力地說。好像是有誰在說他過「左」似的。

我知道鬥爭必須用「說服」的方法來進行，不能「獨斷」，我便沉默着，只是注意着使問題向着正確的方向發展。現在，問題就是向正確的方向發展了。伊藤和須山並不是從理論出發而是從解決工廠內部時時刻刻的動態出發的，於是在工作方式上就取得一致的正確的意見。這是由於不脫離工人羣衆的生活，使我們的理論與實踐得到了自然的統一。

——我對須山說，這種所謂過「左」的說法，只是卑劣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爲了掩

蓋他們自己在實踐上的失敗主義，向反對它的人戴上一頂大帽子罷了。須山說：「對啦！」

這樣，就提出了我的方案。在一剎那間，感覺到被壓抑似的緊張，但很短的一瞬間就過去了。

「我也這樣想……」

須山帶着有點生硬的聲音，第一個打破了沉默。

我向須山看了一眼——他說：

「這當然應該由我來！」

我點了點頭。

伊藤的身體好像突然僵硬起來，只是用眼睛來回的望着我和須山。——我向伊藤看了一眼，她低聲說：「我——沒有不同的意見……」

看須山時，只見他盤腿坐着，無意識地把一只蝙蝠牌香煙的空盒子撕成一條一條的。

● 一九二六年以前，日本共產黨內的關門主義傾向的代表人物是福本和夫，因此日共的「左」傾機會主義又叫做「福本主義」。一九二七年在共產國際的積極幫助之下，日本共產黨清算了福本主義。

作了這個決定以後，出現了一陣短時間的寂靜。耳朵裏立刻聽到剛才一直沒有注意到的大街上行人的腳步聲，和不斷喧叫着的夜市商人們的叫賣聲。

接着就討論具體問題。——最近，他們發現傳單和防毒面具都是因為沒有對女工檢查身體，由女工帶進去的。所以，對女工的身體檢查，突然嚴格起來了。我們決定那一天由伊藤負責，讓她穿上那種把兩腿用膠皮帶箍得緊緊的短褲，把傳單放進去。在那天早晨，她到S那裏把傳單取來，就到街上的公共廁所裏，把它放進短褲裏。進了工廠以後，按照約定的時間，仍舊利用廁所，再把傳單交給須山。須山就在午間休息的時候，在屋頂上散發。

開完了會，一直在壓抑着的感情，突然沖上了胸口。我對須山說：

『恐怕要好久不能見面啦……』

『我有兩個這樣的朋友，』須山說：『他們是兩個很好的朋友，一個是在「三·一五」被捕的，判了三年。另一個是第二年的「四·一六」●被捕的，判了四年。「三·一五」的那個出來以後，本來想歡歡喜喜的等着「四·一六」那個朋友，可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他又被捕了，判了三年。當他第二次進監獄的時候，他說：「我和他大概總是這樣輪流坐牢，永遠見不着了！」可是，這樣也不壞……』

接着，須山自己又說：

「這大概是我最後的「典故」了？」

我和伊藤不覺笑了出來。可是，臉上却硬繃繃的像要哭的一樣。

「不管出了什麼事，只要這兒的組織存在，鬥爭扎下了根就會繼續下去。你可不要被他們抓住！要是你也被捕了，那就連我幹的事也白白幹了！」須山說。

我們決定按照今天談的那樣去做準備，約定二十六日晚上再碰一下頭。

「好吧……」說着就都站了起來。這時，我和須山兩個無意識地站在屋子正中，用力握緊了手。忽然，須山像個孩子似的鬧起來，對我說：

「怎麼？佐佐木的手原來這樣小呵！」

須山一邊向外走，一邊對我說，怕以後沒有機會，又到我家去了一趟。他說：「你媽媽不知怎的，好像一天比一天的顯得更瘦小了……」

●「三·一五」事件，發生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田中反動政府在這一天的大批逮捕革命工人，對

國內革命運動開始了血腥的鎮壓。「四·一六」事件，發生於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田中反動政府更殘酷地迫害革命工人，大約逮捕了三百多名共產黨的同情者。

「……………」  
我原想說些什麼話！可是他說的「一天比一天顯得更瘦小了」這句話，打動了我的心。從他的話裏，好像明白地看見了憂傷的母親的瘦小下去的身影。——我知道不應該在這種時候說這種話！就裝做不在意的樣子，只說了一句「是嗎……」以下的話就說不下去了。

和須山分別以後，因為伊藤到下一次的聯絡還有三十分鐘時間，就跟我一塊兒散了一回步。我們打算在二十六日為須山開一個小會。決定那天由伊藤買一些點心和水果來。

伊藤平常總是像男子一樣，邁着大步擺着肩膀走道，這是她的特徵。現在走在我身旁，却非常之女人氣的邁着細碎步子。分手的時候，她說：「你稍微等一等！」便走進一家小商店裏去。一會兒，拿了一包東西走出來。

「這個，送給你——」

說着，就把那包東西交給我，我說：「這怎麼行！」她強迫着塞進我手裏。

「這些天，你的襯衫那麼髒！那些傢伙們，專門注意這些地方呵！」

回到住處，把紙包打開來，我忽然發現我正在心裏把伊藤和笠原兩個人做比較。同

樣是女人，我可從來也沒有想把伊藤和笠原比較過。可是和伊藤一比，我開始感覺到笠原離開我是多麼遠呀。

——我已經有十天沒到笠原那裏去了……

## 九

倉田工廠的屋頂上，正在建築第三車間。午間休息的時候，大家都走到屋頂上，有的晒着太陽光睡覺，有的閒談着，有的互相打鬧，有的玩排球。這一天，初夏的陽光刺眼地照射在水泥地上，須山在自己身邊佈置了一些自己人，準備阻礙那些來捉他的人。

正在十二點四十五分鐘的時候，須山突然使勁地把傳單連續地向上拋去，大聲地叫道：「堅決反對大批裁工！」「全體罷工，反對裁工！」……立刻，他的聲音在大家的喧鬧聲裏消失了。紅色和黃色的傳單，在太陽光裏閃爍着。傳單剛散出去的時候，大家「啊」的一聲站住了，但立刻就喊叫着奔到散傳單的地方來。其中有十來個人，氣鼓鼓地把拾來的傳單高高地向上拋出去。因此，開頭只是散在一個地方的傳單，一眨眼的工夫，就散開到六百個職工的頭上去了。——預先佈置在屋頂各處的工廠守衛，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事，一邊張着嗓子大聲地叫道：「不許拾傳單！不許拾傳單！」一邊向人羣

裏衝進去，可是，到底是誰散的傳單，已經看不清楚了，看來好像每個人都是散傳單的人。

守衛們沒了辦法，就守住屋頂的狹口，過來一個人就檢查一個。這樣辦時，再過一個鐘頭也上不了工。當粗大的水泥煙囪響起上工的笛聲時，大家就拉緊着胳膊向那個狹小的出口「噯咳噯咳」的衝過去，守衛再也招架不住了。——這時候，伊藤看見須山在人堆裏悠悠然地走了下來。

以後，工頭向每個人問：「是誰散的傳單？」雖然有人知道是須山散的，可是沒有一個人說出來。青年團那些混蛋們懊惱得很，氣得什麼似的。在這一天裏，須山工作的第二車間和伊藤的降落傘車間裏，工人們的情緒高漲起來，派了代表去和別的車間聯系，發動大家向工廠提出抗議。

下工的時候，須山和伊藤走在一起，須山說：「在這種時候，我也真想哭出來呢！」他把帽子戴一戴正，不停地擦着臉。

在路上，他反覆說了好幾遍：「真沒想到能這樣！」「真沒想到！羣衆的力量真是了不起呵！」

我爲了瞭解散傳單那天的情況，當天很晚的時候和伊藤取得了聯絡。我完全沒想到



須山竟和伊藤一起來了，把跟在伊藤後邊走進來的須山，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知道這無疑是須山的時候，才突然地站起身來。……

我聽了經過的詳細情況，也感到很興奮，就模仿着須山對伊藤說話的口吻說：「在這種時候，我們也可以去喝它一瓶啤酒吧！」三個人就喝了一瓶麒麟啤酒。

決定性的鬥爭，當然得看明天這個關頭了。我們又仔細研究了明天的準備工作。

第二天早晨，工人們剛一上工，工廠對六百臨時工裏的四百個人，每人發給兩天工資，就在工廠大門口解僱了。門口站着十五六個警察，對那些領到兩天工錢，楞生生地在門前徘徊的女工們叫道：「回家去！回家去！」揮她們走開。

在發工錢的窗口邊，掛出一張很大的佈告：「本廠原定廿九日截止工作，故今日宣佈實行。廠方爲照顧工友，特增發兩日工資，希工友們體會廠方此種心意，如廠方有新工作時，當優先採用，特此佈告。」另外留下了二百個臨時工，他們是有打算的，目的是在擾亂工人們的步驟。

被解僱的也有須山和伊藤——在這緊要關頭，他們在我們之前先下了手。須山和伊藤有點喪氣的神氣，我也一樣。敵人是敵人，並不是木頭人。我們必須立即從頭來過，吸取這次失敗的教訓，決不放棄這個逆轉的形勢，使它對以後的鬥爭有利。

雖說是被他們攤散了，在正式工裏還留下了兩個同志。被解僱的工人們，就要分散開去找新的工作，這些人裏就有須山和伊藤小組裏的十來個人。只要以後和他們保持聯繫，我們的鬥爭範圍就會相反地，急速地擴大起來。

他們以為先下了手，就可以打亂我們的工作。可是却沒有料到，正是他們自己的手，散播了我們組織的種子。

現在，我和須山、伊藤，用比以前更大的精力，從事新的工作……

一九三二，八，二十五。

作者附記，這篇作品獻給藏原惟人同志